



INFORMATION OF STUDIES OF LOCAL SCIENCE

地方学研究信息

2018.4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主办

ISSUED BY CHINA LOCAL SCIENCE STUDIES ASSOCIATION

北京学研究所 值编

EDITED BY 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IES

“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讲座课程部分照片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国平与部分听讲师生合影



台湾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副教授荣芳杰与部分听讲师生合影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朴喜用与部分听讲师生合影

地方学研究信息

INFORMATION OF STUDIES OF LOCAL SCIENCE

2018.4



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地方学研究信息》编辑部

值编单位：北京学研究所

主 编：张宝秀

副 主 编：张 勃

责任编辑：成志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邮编：100101

电话：010 64909373

传真：010 64900109

网址：<http://www.bjstudy.com.cn/>

电子信箱：ldbjx@163.com

出版日期：2018 年 12 月 15 日

2018 年第 4 期

（总第 53 期）

内部交流

目 录

地方学研究

- 金国平 澳门学：史料出版与学术进步·····2
谢耀亭 张焕君 晋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6

地方文化研究

- 陈耕 闽南文化研究新世纪的回顾与新时代的前瞻·····11
李殿光 挖掘地名文化资源 深入开拓地方学研究领域
——基于张家口地名文化案例·····20

学术信息

- 徽学研究中心简讯 ·····26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简讯 ·····29
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8 大事记 ·····31
“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系列讲座课程顺利开展 ·····33
多名专家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 ·····39
首都文化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二十一次北京学
学术年会通知（1 号）·····42

学会工作

- 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通知（第 1 号）·····47

澳门学：史料出版与学术进步

文 | 金国平¹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学”的概念由几位澳门学者提出。近30年来，学界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维度研究澳门，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首先，澳门政府制定了对史学研究积极推动的政策。其次，澳门基金会成为澳门学的一个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具体策划并实施了各项工作，尤其是在组织、协调研究项目、出版史料、书籍、期刊、举办、参与或组织参与各类学术活动，以及资助澳门内外的各种研究及学术活动中，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

关键词 澳门学 澳门基金会 史料出版
学术进步

20世纪80年代，几位澳门学者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近30年来，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维度研究澳门，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澳门学是构建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的载体，而本土知识和本土话语体系则是澳门学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目标。吴志良、张中鹏：《本土化：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吴志良博士学术访谈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2页。”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成了世界级澳门研究的重镇，澳门学成为了澳门名片与软实力的象征。今天，澳门不仅以拥有可与拉斯维加斯媲美的博彩业，还有堪称世界瞩目的显学——澳门学。我既是参加者，又是见证者。

如何在短短的三十载内取得了这个成就？首先，

与澳门政府对史学研究积极推动的政策有关。其次，澳门基金会成为了澳门学一个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具体策划与实施了各项工作，尤其是在组织、协调研究项目、出版史料、书籍、期刊、举办、参与或组织参与各类学术活动，以及资助澳门内外的各种研究及学术活动中，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长期担任澳门基金会领导职务的吴志良博士，作为“总设计师”，构思和执行了史料出版“运动”，使其成为了澳门基金会的常态性工作之一。对史料出版做出的这个战略定位，需要学术眼光。从葡语语言学学士到历史学博士的学历为他担负起推动澳门学术发展之重任创造了必要条件。

我主要谈谈史料出版与学术进步。出版，尤其是史料的出版虽然并非澳门基金会投入资源最多的一个领域，却是诸多工作中最为众人，尤其是学者认识和称道的。从1994年开始出版工作至今，澳门基金会非常重视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了多种大型史料集，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澳门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如António Aresta;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Arquivos do entendimento : uma visão cultural da história de Macau*（相互认识案存：澳门历史的文化视野），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de Juventude, Fundação Macau e Instituto Politecnico de Macau, 1996。此书主要收入《澳门档案》内公布的档案资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6卷）。该书对有关澳门问题的明清档案认真筛选、系统整理和编纂，辑录明清时期除档

¹ 作者简介 金国平，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 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

案以外的汉文文献资料，旨在全面反映明清两朝澳门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总字数达 370 多万字，分别收明清历史档案 2197 件、明清文献 397 种。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 年，2 册）。该书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从葡萄牙档案馆缩微复制的清代官私中文文书编注而成，是存放在葡的澳门中文档案的最完整、系统的整理汇编。这批档案逾 1500 件，主要形成于中国清代乾隆朝初期到道光朝末期。其内容十分丰富，集中反映澳门地区中葡双方官员政务往来的情况，有助读者加深对中葡关系的模式和当时澳门地位及重要性的了解，为中葡两国学者更科学、客观地研究澳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金国平、吴志良编注《粤澳公牒录存》（澳门基金会，2000 年，8 卷）。该书获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的无私协助，全档公开，是为《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的葡文姊妹篇，收录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有关澳门中文档案的葡语翻译件及回函，共计 2010 件，时间上起 1749 年，下迄 1847 年。编注者还为此书撰写了长达 61 页的前言并编制了 12 种附录。萨安东主编、金国平汉语统筹《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葡中关系研究中心，1997-2000 年，10 卷）。该书收录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大量有关葡中关系和澳门的葡中两种文字档案，分为专题系列（4 卷）和通史系列（6 卷）两种，有汉语目录。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 年）书中第二部分为早期关于澳门的葡萄牙语及西班牙语史料编译。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 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汇集了多语种西方澳门史料。邢永福、吴志良、杨继波主编，金国平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 年）。清宫藏关于澳门档案的选编。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6 卷）。该书由澳门基金会资助并组织策划，载有大量已出版及未出版的珍贵中葡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记录上起 1494 年教宗子午线的划分，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 450 余年澳门的历史，以澳门本土史为主线，并穿插中葡关系作为辅线，是迄今澳门史研

究中资料最丰富、内容最全面的一部历史学巨著，更获得国家图书提名奖。吴志良主编《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16 卷）、《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全档）》（32 卷）、《民国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29 卷）（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澳门基金会、葡萄牙外交部档案馆、澳门大学图书馆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2015 年，2016 年）。该系列书籍辑录了现藏于葡萄牙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有关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的中、葡、英文的原始档案，多形成于 1895 至 1947 年间，涉及地域以粤、澳为主，兼及港、桂、闽及东南亚等地，其出版是中葡两国文化合作的一大成果，对于研究澳门历史、粤港澳关系、中葡关系乃至中国晚近对外交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民生等均具有重要价值，获学界高度好评，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二五”出版规划重点选题，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这些外交密档的内容十分丰富，且大多为孤本，长期以来鲜为中国及国际学术界所知，因此，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好评如潮，也开始用于有关研究。这套档案汇编已经出版的 77 卷是迄今为止澳门历史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最大型史料集。若全部出齐，总数可达 240 卷。Miguel Rodrigues Lourenço, *Macau e a Inquisição nos Séculos XVI e XVII (澳门及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文献卷) - Documentos*, 2 vols. (CD),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e 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2012。

此外，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出版的《澳门研究》上也经常刊登大量引用史料的论文。

近来，澳门基金会支持澳门科技大学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地图资料库，已上网 800 多副澳门及澳门所在地区的图集。

2015 年，澳门基金会支持了葡萄牙中国观察（Observatório da China）的《十六至十九世纪的澳门与中国（Descrições de Macau-China dos Séculos XVI ao XIX）》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澳门史料数字门户（Portal Digital FONTES MACAU）》。这个网站已经上网了 200 余部有关澳门和中国的基本书籍。可从中国观察网站（<http://observatoriodachina>。

org/index.php/pt/fontes-macau-china) 或葡萄牙国家图书馆 (<http://www.bnportugal.pt/>) 的官网进入。

澳门回归以来,澳门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退潮,但澳门基金会成为了中流砥柱。“舞照跳,马照跑”的同时,“书照出,会照开”。除了澳门,目前的澳门研究有两个重镇。一是葡萄牙里斯本的澳门科技文化中心(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这个属于葡萄牙科技部的机构与澳门基金会合作,出版了多种有关澳门的书籍和史料。之外,每年还召开有关澳门的年会。二是广州暨南大学。原来的掌门人是汤开建教授。汤教授到澳门大学后,叶农教授扛起了澳门学的大旗。目前的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门研究中心已经升格为马万祺澳门学院。将于今年十一月与澳门基金会联合举办第五届澳门学会议。除此以外,正在致力于出版各种有关澳门的书籍和史料。已经出版了首次汇集一个传教士中外著作的《庞迪我著述集》,《熊三拔著述集》也正在编辑中。

文化繁荣的基础是学术繁荣,而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是要有学术研究不断的新突破。突破则有赖于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出版。“……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科学地挖掘、搜集、出版、翻译和研究澳门原文件资料,澳门史原貌才得以逐渐恢复(吴志良、张中鹏《本土化: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吴志良博士学术访谈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7页)。”

在此,我们不准具体论及在史料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学术进步,而是谈谈学术进步的结果。

经过三十年来的努力耕耘,澳门基金会已成为澳门主要的书籍出版发行者之一及最主要的史料出版者。澳门基金会的出版工作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与学术繁荣,带来了澳门研究话语权的转向、本土话语体系的构建,澳门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有力地推广了澳门历史形象与推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

史料整理与出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基础性系统工程,需要有长期、中期和短期安排。展望澳门学的未来,我们认为有以下几项工作可以作为中期和短期设计,提上议事日程:

(1) 从整体研究而论,澳门学重古代而轻现代。

经过我们前几年的呼吁,澳门19世纪的研究得到了改观,尤其是林广志博士作了较好的19世纪开始的华人社团的发展的研究。为何产生这种情况?大概与古代史研究史料出版与研究成果多不无关系。要推动现代史研究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加大现代史研究史料出版与国外,尤其是葡萄牙研究成果译介。史料方面,可以考虑整理出版1949年以后的史料,如萨拉查个人档(Arquivo de Salazar)。

(2) 澳门军事史是澳门学的一个薄弱领域。澳门能够生存下来,驻军和军事设施是保障。现在除了对古代城墙和历代炮台的涉及外,论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不多。文德泉神父的巨著《澳门军人》是否有应该早日译成汉语?文神父在写此书时,因条件的限制,未能利用里斯本军事档案馆内保存的大量有关澳门的资料。我们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这批军事资料,以完全澳门学的学科。

(3) 葡萄牙历史上有一个二元君主时期,两国共事一主。当时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国王,同时又是葡萄牙一世国。1580-1640年间,这正是澳门迅速发展的60年。在葡萄牙人管治澳门期间,这段历史多被回避,如同1974年民主革命以前,葡萄牙对穆斯林在于比利亚半岛的存在刻意隐瞒一样。澳门特区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客观地了解西班牙人在澳门的活动极其影响,进一步认识澳门历史的全过程。崔维孝著《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 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崔维孝著《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 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从明清之际来华方济会的角度出发,利用《方济会在华文献集》对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从1579年(明万历七年)第一次入华到1732年(清雍正十年)这一百五十多年的传教活动进行陈述、分析和论述。台湾清华大学的李毓中教授对西班牙史料的情况作了介绍和一些翻译。澳门基金会出版了Lúcio de Sousa, The early European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ast Asia(1555-1590):the life of Bartolomeu Landeiro (欧洲早期在中国、日本、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存在(1555-1590):巴罗多美·兰德罗生平事迹)(Macao: Macao Foundation, 2010)。此书完全根据西班牙语

史料写成，回溯了一个在远东活动的重要葡萄牙船长巴罗多美·兰德罗的生平事迹。在葡萄牙——西班牙及中国——西班牙关系范畴内而展开的西班牙在澳门的存在，有许多方面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如西班牙早期教堂建筑，即三座西班牙宗教建筑——板樟庙（即今玫瑰堂）、龙嵩庙（即今圣奥斯定堂）和咖斯兰庙（今存南湾公园及嘉思栏兵营）的历史。前两个建筑在第2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05年7月15日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还有与之相关的西班牙会团在澳门及明代菲律宾与中国和澳门关系等方面。

（4）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任何一个史学者，受条件所限，不可能搜集齐一个研究课题的全部史料。即使是收集到的资料，因语言限制无法自由全部阅读和理解。因此，史料翻译是普遍提高历史研究水平的一个关键。澳门在回归前，曾经连续出版过《澳门档案》，而且还汇集成册再版过。所发布的都是收藏在澳门议事厅的手稿文件，内容十分丰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懂的葡语学者可以利用，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重启葡语文件的转写与出版，并出版汉语版，以扩大其使用面。

（5）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为葡萄牙最早在中国大陆设立的领事馆之一。在设立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之前，葡萄牙曾任命过名誉领事和设立领事馆（具体日期待考），但其档案均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分散于外交部档案馆的各个专题档案中。有些转入了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的档案。只有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的档案形成了全档。虽年份较短，但比较集中。该总领事馆档案涉及中葡两国关系及当时上海诸多事宜。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于1952年撤离中国后，整批档案资料悉数运回其国内，藏于葡萄牙外交部档案馆，从未面世。全档分为200多个卷宗，分存于4个档箱。全宗收录的为1919—1952年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工作文档，包括中、葡及其他西方语言的资料，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社会民生，中葡关系、粤沪关系，以及历任葡领履历和与中国当局交涉的往来函件。主体文档形成于1919—1952年，但也有个别早于1919年的文献，如两张1855年和1890年的租地

凭证，即“道契”。这是首次在外国档案中，发现此类档案。可以相信，在其他国家的领事档案中，也应该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末期的档案，即1952年的档。它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特别是撤侨的资料，尤为珍贵。这批史料对于了解、研究上海的历史和发展以及中葡两国的近代交往历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一）完整性。这是藏在葡萄牙外交部的原始档案全宗。（二）唯一性。这批史料自运回葡国后，再没有人对其进行过任何整理、编辑、出版、复制工作。最近才出现了一些研究。这批史料在葡萄牙和中国的档案界、出版界都是唯一的。（三）权威性。这批史料详细记录了当时葡国领事馆处理各方面事务的情形，从大量日常事务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葡萄牙驻沪总领事馆在行使、落实领事裁判权等治外法权方面的实际情况，对了解、印证当时中葡两国的关系提供了真实、权威的证据。总之，这批档案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极高的史料价值，为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城市史、经济史、租界史、社会史、法制史、房地产史及上海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我们认为有出版《葡萄牙外交部藏驻沪总领事馆档案》的必要且意义重大。若能以原生态出版《葡萄牙外交部藏驻沪总领事馆档案》，它也将像《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一样，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它将成为研究中葡关系、澳沪关系及上海外侨史和城市史最重要的原始史料之一。

吴志良博士最近指出：“当前，澳门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也是澳门学面临的历史任务有三：一是正本清源，确认历史的主体性；二是消除模糊状态，回复历史原貌；三是构建自主的澳门史解释体系（吴志良、张中鹏《本土化：澳门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与阐释——吴志良博士学术访谈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1页）。”

三十年的史料整理与出版历程说明，这是澳门学学术发展和话语权回归的基础。这条路，今后还是要走下去！

晋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文 | 谢耀亭 张焕君¹

摘要

山西师范大学的地方学研究，从最早的晋国史研究，到三晋文化研究，再到晋学研究，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的历程，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晋学的理论框架体系及研究定位不断完善，这既是晋学研究不断成长的历程，也是从“地方史”到“地方学”转变的历程，更是晋学研究定位不断完善的过程。晋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在基本资料的整理、研究的范围及目标、晋学精神的提炼和概括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实践方面，也积极服务于地方，同时注重地方学人才的培养。经过对晋学研究的回顾，可为今后晋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关键词 晋学 地方学 山西师范大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首先提及“晋学”一词，此后半个多世纪，不见有人再提“晋学”问题。直到上世纪末，李元庆、张有智等先生重提晋学，并认为应把“晋学”研究置于山西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时代赋予“晋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晋学”研究如同“北京学”、“鄂尔多斯学”、“泉州学”、“徽学”、“楚学”一样，是中国地方学研究大家庭中的一员。张有智先生曾对晋学相关概念有过总结：“晋学主要是研究山西地区历史文化和

历史变迁、政权组织、民族文化交流、生产生活、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民俗风情、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民歌、绘画、雕塑等）、文物考古、生态环境、山西人的精神、当代山西发展中的问题与出路等等。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有：历史学、考古学、哲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领域。”²“晋学”研究，走过了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断丰富过程，走过了一个由“小晋学”到“大晋学”的认识过程，对“晋学”的理解与定位，大致与中国地方学的理论、实践发展呈同步状态。

一、晋学研究机构的发展历程

1980年，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仁在李孟存、卫文选、常金仓等先生的带领下，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and 办出地方文化研究特色的先进理念，建立起“晋国史研究室”，晋国史的专门性研究自此在全国率先起步。应该说，晋国史研究室的建立，是全国地方文化研究热潮兴起的产物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研究人员也由最初的两三位老师不断扩大，形成一支朝气蓬勃的研究队伍。围绕着晋国史和山西地方史出版了《平阳史话》、《晋国史纲要》、《山西史》、《山西历史人物评传》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和论文，发展态势良好。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晋国史研

1 作者简介 谢耀亭，1980年，男，山西右玉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儒学史、三晋文化。

张焕君，1972年，男，山西灵丘人，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儒学史、三晋文化。

基金项目：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文献·考古·田野——历史学研究生地方特色课程（《晋文化研究》）的教学与实践（2017JG57）

² 张有智：《晋学概念及其他》，《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1日。

究的重镇，1992年，举办了全国晋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1999年将“晋国史研究室”易名为“三晋文化研究所”，继续以三晋文化为主要对象，开展研究工作。

2003年，山西省大力推进“文化强省”战略，鉴于山西师范大学晋国史研究和地方学研究的团队力量和影响，决定依托这支队伍建立了“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次年10月，又建成了一座“晋学博物馆”。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是省委宣传部为贯彻落实“建设文化强省”战略目标而组建的八大研究中心之一。中心由省委宣传部领导，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研究中心具体协调指导，是省级高层次、松散型的科研联合体；中心由校方实行管理和提供支持，高等院校内部列入计划、相对独立的科研单位；中心的具体工作由主任、副主任负责。中心采用新的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学科和人才资源，与当地县政府、文化局合作，打破地区和部门的局限，以课题为纽带，加强各专业人才的联合与协作，形成开放式搞科研的格局。地方文化类课程设置上形成理论教学——校内实践——校外实践的教学体系。

山西省晋学研究中心宗旨：建构和完善晋学学科体系，建立大晋学。从晋国史、三晋思想文化、山西地方文献、山西宗教史、山西抗战史、山西妇女史等方面，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山西区域社会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彰显山西的地位与贡献，以期为山西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提供借鉴。

这一时期，三晋文化研究方面主要出版了《先秦三晋地区的社会与法家文化研究》、《三晋文献集》、《魏国史话》、《山西历史与文化》、《晋国文化十八篇》、《晋学探微》、《山西佛教史》、《临汾宗教》、《陟彼阿丘：首届晋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日月其迈：山西文化名人访谈录》、《云谁之思：山西古代壁画研究》、《洵美且异：山西历史文化研究》、《第二届晋学与区域文化国际研讨会暨荀学与诸子学论坛论文集》、《记忆、表演与传统——当代文化语境下安泽文化寻踪》等专著，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动态》、《孔子研究》、《史学集刊》、《史林》、《安徽史学》、《妇女研究论丛》、《晋阳学刊》、《山西师大学报》等报纸、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

通过晋学研究机构的变化，可以看到，晋学研究走过了由“地方史”到“地方学”的转变，这与近些年“地方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不无关系。当前冠之以“学”的，仍然有许多应是地方史研究、或地方文化研究，而非真正意义的地方学。地方学，应是立足于地方（或区域），以当地历史、地理、风俗等内容为基础，探寻地方发展规律、提炼地方精神内核，为地方当代的全面、持续、内涵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学问。即地方学的目标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当前以及未来，这是地方学与地方史、区域文化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但既名地方学，即有其地方性，其与中国学，又是“理一分殊”之关系。地方性又基于其历史、地理因素而形成，这又是地方学与地方史、区域文化的内在联系。

二、“晋学”学科的建设

是否可以冠以“学”？自上世纪敦煌文献发现后，学界便开始探讨。探讨的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于对“学”的界定标准各异，理解又各有分歧所致。但近些年地方学发展的事实是，许多地方学的命名和研究机构的兴建，使地方学研究走向全面繁荣。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地方学发展的道路上，与其先探讨、界定“某某学”是否可以成立？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研究工作，当研究工作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学”也便慢慢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或许这更有助于地方学研究的推进。虽然用事实来证明“某某学”的合理性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是否我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做具体的研究，不再考虑构成“某某学”的一些理论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其理论性也不可忽视。既然名之以“学”，便要建构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研究才会更有生命力，更加持久，更加深入。在地方学的理论体系中，其学科体系的构建是地方学研究中亟需研究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地方学的研究对象，更涉及到地方学的研究内涵和发展方向。

学科体系的构建，对于一个学科正规化、科学化有着重要意义。许多地方学都着力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大致而言，我们认为地方学应从三个层面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第一个层面是基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利用现代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包括各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第三个层面是精神层次的提炼与概括。

(一) 基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中国地方学的发展,与地方史的研究密切相关,或者说,地方学从地方史中走出,而又超越了地方史的研究。由于中国史学的发达,宋代之后,方志学的兴起,一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域特色便主要记录在方志中,这样的事实也导致了在中国地方学的研究,自起步始,便与地方史的关系密不可分。这样的特点,有对地方学研究便利的一面,可以使地方学的研究建立相对坚实的基础,使地方学的研究避免走向理论的空谈和对当地的脱离。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³近百年前的论断,直到今日,仍然掷地有声,诚为确论。地方学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地方学的研究,也应以基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为第一紧要事。从较早的敦煌学看,最终敦煌学的确立,也是利益于敦煌文书的发现。其他影响较大的地方学研究,也无不得益于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如徽州文书之于徽学,新出土楚简之于楚学。没有大量的基本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冠以“学”的基础便不太坚实,随之而来的研究,也会大多流于泛泛而谈,或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发展中的点缀,从而使地方学的研究无法持续深入。

就目前地方学研究来看,地方学研究较好的,无一例外,把基本资料的收集 and 整理工作做的相当好。如敦煌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世纪之初,敦煌学专家有感于敦煌文献藏地分散,编排杂乱的情况,集多人之力,费数年年之功,开始编撰《敦煌文献合集》,2008年,合集的首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面世,共十一册,六百余万字。这样的工作有利于敦煌学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使敦煌文献为各个学科使用。再如徽学的发展,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的数量达到35万份,这批资料也在不断收集整理当中。《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已整理出版,这对进一步扩大徽学的影响,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楚学的兴起,以楚地新出土资料为契机,由于近年来楚简的大量发现,且楚简的内容许多为学术性作品,故

而楚简受到了整个学界的重视,目前基础资料的整理也时有所见,如《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的出版,便是这方面工作的体现。

以上地方学基本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做的好的,也有其客观的原因,那便是这些地方都有相对集中的资料被发现,随之而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进而促成相关学科的建立。那么,对于其他没有新资料集中出土的地方,是否因为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而放弃了史基本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呢?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对于地方学研究是第一紧要事,不能忽视,更不能懈怠。没有相对集中的新材料发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更加突显出基本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已成为制约地方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新史料的发现,在当代并非仅有考古一种途径获得。当代民间仍有大量史料值得人们去搜集,例如邯郸学院于2013年入藏了十多万件华北地区乡村历史文献,地域上涵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因以太行山区为重点,所以命名为“太行山文书”。这批文书内容之广、数量之多,涉及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诸如此类的文献,在民间为数不少,如能大批量的发现,对促进地方学的研究,尤为重要。

对于晋学而言,虽然也曾有新材料的发现,如侯马盟书的发现,但因盟书发现本来不多,而且内容相对集中,加之可以辨认的又很有限,虽曾引起学界的重视,却无法带动晋学研究的巨大进步。晋学的基本资料收集整理依然是目前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些年我们也在陆续做着这样的基本工作,如我们出版了《三晋文献集》(先秦卷),把先秦时期关于三晋的相关史料加以收集整理,方便了此阶段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准备将工作继续往后做,且对先秦时期的文献进行编年整理。

总之,基本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既是能否冠以“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是地方学能否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 分门别类的分学科研究与各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地方学的内涵决定了地方学的研究对象。地方学是研究某一特定区域的学问,更加侧重的是系统性的研究,目的不仅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传承,更重

3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清华周刊》,1925年第1期。

要的是推动当地社会和谐有序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内容与目的，也决定了地方学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并非一门学科便可以完全承担。

如晋学研究，如前文所言对“晋学”做的界定，以及我们对地方学的认识，则晋学研究并非某一学科但可完全胜利，必须要多学科合作进行。如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化学等学科合力协作。

研究成果，最好是以丛书来集中体现。丛书的编撰，可以使研究更有计划，避免研究的重复浪费。丛书每一个专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但整套丛书的研究却又涵盖较广。同时可集中主要的人力财力，进行高效工作。丛书的影响较之单本研究也较为广泛，更容易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如楚学的兴起，学界的关注便与《楚学文库》的出版有相当大的关系。《楚学文库》共18部，数百万字，其出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楚学”也随之成为地方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晋学研究，这些年也一直在做研究性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成果未能得以集中展现。能在学界被常常征引的重量级著作还较少，也未有以丛书的形式编撰能广泛涵盖晋学的诸课题，这也是晋学研究在当代各地方学研究中，未能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好在我们也开始筹划出版《晋学文库》，并已出版了《晋学探微》，假以时日，当《晋学文库》的出版积累到一定数量，晋学研究便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精神层次的提炼与概括。精神层次的提炼与概括，是地方学研究中层次最高，也是工作最难开展的领域。而精神层次的提炼与概括，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回应着或者说解决着“某某学”的内涵、外延以及其特色所在的问题。之所以会有“地方学”的出现，本身便昭示着这一地域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全国完全一个样，也不会有所谓的“地方学”的出现。而一个地方的精神提炼，又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这是构建地方学学科体系，必须要面对的工作。

地方学研究中精神层次的提炼与概括，是建立在对地方学各个门类的坚实研究基础之上，并非是空想而来。因此，这样的工作是属于思想史的浓缩、提炼工作，而非哲学中的概念辨析。晋学的研究，也一直

为此努力着。

晋学的精神内核，是形成于晋国时期。从山西简称“晋”来看，也能感受到山西的历史文化中，晋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晋国的文化奠定了后世山西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晋国以及后来的三晋，正处于中国文化的原创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历史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期”（Axial Period）的概念。他认为轴心期是“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从时间上看，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这段时间内，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期”。轴心期的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中国、印度、西方）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它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⁴雅氏“轴心期”的说法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就人类经历之历程而言，人类文明集中于此阶段得以突破，此为历史之事实，因此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称这段时期为“哲学的突破时代”。近来来，我国学者多谓此阶段为“原创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是人类最重要的突破时期。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文化，奠定了人类的文化模式，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轴心时代的智慧，是一种原创的智慧，也是一种影响力历久不衰的智慧。在山西历史上，晋国与三晋时期，正处于这样一个原创时代，晋文化的精神也奠定了后世山西文化的精神。因此，晋学研究精神层面的提炼与概括，是建立在对晋国、三晋历史文化的坚实研究之上。

构建学科体系，将会使地方学的研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会使地方学研究更加科学化，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种种研究随意化、庸俗化的情况，使地方学研究步入健康的轨道，研究成果能经得起学界的检验。

4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页。

三、晋学研究的社会实践

地方学既然是研究某一地区的学问，则服务地方是其重要功能之一，或者说，地方学研究的归宿，是为服务地方当代社会的发展。研究服务于地方，可以使研究成果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从而突显出地方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服务是地方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地方学研究的生命。地方学研究要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就要坚持以服务地方发展为宗旨，使地方学研究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地方学研究就会引起政府的重视，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不可否认，学术研究，除遵循学术本身规律外，外界的支持对于学术研究也非常重要。地方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获得各方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寻求各方支持，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国家的支持，对地方学的发展，影响颇大。如敦煌学近些年的发展，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齐鲁文化近年来迅速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及地方的大力支持。而晋学近年来发展迟缓，原因众多，但没有得到地方及国家的有力支持，也是造成其缓慢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地方学研究，能服务于地方，也能获得地方支持，如此，则地方学研究步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晋学研究中心积极践行服务地方的理念，筹办、参与地方文化研讨会，为地方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献言献策。诸如安泽碑刻研究、曲沃碑刻研究、洪洞碑刻研究正在进行，以后一个县一个县地研究；还有县域研究系列：安泽民俗与社会、安泽方言文化研究、红色安泽研究以及山西宗教文化研究；宋金元时期的山西研究等等。同时，我们也为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工作。诸如与安泽县合作举办多届荀子文化节高层论坛，并促成山西师范大学与安泽县人民政府共建荀子学院的建立即是显例。其他如侯马、乡宁、曲沃、洪洞、襄汾、古县、古交、山阴、偏关、高平等县市的文化研究与建设也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为山西省的炎帝文化、尧文化、大禹文化、晋国文化、荀子文化、边塞文化等研究提供了智力支撑，将“地方学研究服务地方”的理念贯彻下去。

四、晋学研究的展望

晋学研究，虽然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相对全国地方学研究而言，发展的道路上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也正是以后晋学研究需要着力建设的方面。

（一）建设研究团队，明确研究方向。晋学研究团队虽然从学术传承来看，并未中断，但形势也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自2010年以来，引入大量青年博士，为研究团队储备了大量人才，为以后打造研究团队奠定了基础。今后将积极争取各种政策的支持，努力打造有凝聚力的研究团队。明确重点研究方向，并依据研究方向组建不同的研究团队，以使研究高效、长久。

（二）进一步做好基础研究工作。基础性的学术工作，是学术研究长久发展的不竭动力，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尤其是一些不被现代评价体系看重，而对学术发展又至关重要的一些基础工作，如资料编年、目录索引、专业辞典等的编撰与研究，为晋学研究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三）完善晋学课程体系建设。在探索、完善晋学学科建设理论的同时，积极在高校完善晋学课程体系，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使晋学的相关课程设置更加有科学合理，更加系统完善。

（四）坚定服务地方的宗旨。继续坚持地方学服务地方的宗旨，在晋学研究团队中，依据不同的学术专长与学术背景，组建不同方向的研究团队，为更加有效的服务地方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更加有意识的、以积极的态度服务地方社会发展。

（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积极推进学术交流，提升“晋学”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力。至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两届“晋学与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晋学”研究得到全国地方学研究者的关注。同时，加强与全国各地地方学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加全国地方学会议，如北京学会议、鄂尔多斯学会议、泉州学会议、扬州学会议等，并在大会宣读晋学相关论文。加强与全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联系，并努力在合适的时机，在山西师范大学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一次全国地方学研讨会。

闽南文化研究新世纪的回顾与新时代的前瞻

文 | 陈耕¹

摘要

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的回顾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顺应天时，问题导向，走历史要走的路，和人民一起前进，为国家贡献智慧，从边缘走向舞台的焦点。从回顾引入前瞻，世界的潮流将引领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四个走向：第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推动中国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兴盛，将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走向。第二，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构建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闽南文化有历史和现实的优势，需要理论的总结和引领。第三，世界走向海洋和湾区建设的潮流，提出厦漳泉同城化共建闽南金三角湾区城市群的课题。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闽南文化有先期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启示今天。

中国的潮流将推动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三个走向：第一，争取两岸和平统一，闽南文化大有文章可做。第二，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世界潮流，闽南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第三，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闽南学有无尽的问题与天地。

关键词 闽南文化 回顾 前瞻

一、引言

新世纪闽南文化的回顾和新时代闽南文化的前瞻

共分六个方面，作者梳理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抛砖引玉。

从新世纪开始，首先是2001年在厦门市政协十届副主席、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的推动下，由厦门市政协主办，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承办，举行了“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此后，由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推动和主办，两年一届相继在泉州、漳州、金门、台湾、龙岩举办了五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讨会。2004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2006年开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2007年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更是不断地推动了闽南文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地深入和开展。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和台湾成功大学联手推动的金门学研究，首先开启了台湾地区闽南文化研究的热潮。2011年，成功大学成立了“世界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和“世界闽南文化资料库”，并连续组织召开“世界闽南文化论坛”。

2012年，由刘兆贤任会长的台湾文化总会在台湾主办了“首届世界闽南文化节”，并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论坛”。其后，2013年在泉州，2014年在澳门，2015年在金门，2016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相继举行了五届“世界闽南文化节”和“世界闽南文化论坛”。

在这期间，泉州师院泉州学研究所所在林华东院长的组织下开展了对闽南文化多学科的研究，举办了多次的学术研讨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泉州市委宣传

¹ 作者简介 陈耕，男，1948年生，中共党员，厦门人，1969年高中毕业下乡永定县，1978年调福建省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81年调厦门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编剧，曾任厦门市文化局艺术科副科长，创作室主任，台湾艺术研究所所长，闽南文化研究所所长，歌舞剧院院长。现任福建省民间戏曲学会会长，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部辖下的泉州学研究所创办了图文并茂的《闽南》杂志，对传承、传播、研究闽南文化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漳州闽南师院的闽南研究所及其创办的《闽台文化交流》杂志，长期致力于闽南文化的资料挖掘与研究，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林晓峰书记的领导下，将闽南文化研究所升格为闽南文化研究院，将漳州师范学院，改名为闽南师范大学，并成功申请建立“闽南文化与两岸交流”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建立了高校闽南文化研究的重镇，对闽南文化研究未来的影响极为深远。2015年更推动成立了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团结了更多热爱闽南文化、有志于闽南文化研究的人员，举办了学术年会、文化沙龙、学术讲座，撑起了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的大旗。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在1999年加挂了闽南文化研究所的牌子。在2000年成立了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方友义同志担任会长。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闽南文化研究》内刊杂志，并组织编写了《闽南文化丛书（通俗读本）》共十本，在台湾和福建分别出版，编写《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闽南文化资料丛书》、《闽南方言与文化进学校教材》等宣传普及本和《闽南文化研究论丛》、《文化生态保护——以厦门市闽南文

化生态保护区为例》等研究著作。

中央“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以后，2015年，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和马来西亚侨生公会总会结成友好协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办两届“海丝文化论坛”。在中国驻马大使馆的支持和推动下，在马来西亚举行两届“峇峇娘惹文化研习营”。同时联合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闽台送王船”和马来西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王船巡游”联合申报世界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16年举行了有民盟中央和全国15个文化生态保护区参加的“共同推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研讨会”。

上述研讨会和厦漳泉三地所推动的闽南文化学术研究和各项活动，展现了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学术研究、传承传播活动的全面、热烈、有序和卓有成效的局面，需要我们认真地回顾总结，为新时代闽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局面梳理脉络，厘清思路，登高望远，提升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

18年来，闽南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数量很多，不胜枚举。笔者主要集中于六次海峡两岸的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和五次世界闽南文化论坛。其论文情况见表1。

表1 闽南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内容统计

学术研讨会	历史	现实	闽南	台湾	海外	民俗	艺术	方言	建筑	学术本体	华侨	非遗
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1.12厦门）	5	55	45	14	1	6	9	6	3	2	2	0
第二届（2003.9泉州）	26	4	26	3	1	0	0	2	0	2	2	0
第三届（2005漳州？）	25	63	26	4	6	17	5	11	7	20	2	
第四届（2007.12厦门）	73	42	76	37	2	28	6	2	11	4	5	3
第五届（2009台湾）	32	9	29	12	0	4	6	1	2	0	0	0
第六届（2012龙岩）	63	25	58	27	3	19	10	3	2	0	5	8
合计	224	198	260	97	13	74	36	25	25	28	16	11
2011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金门）	17	2	3	12	2	5	1	0	5	0	2	0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2013泉州）	24	23	42	8	5	18	1	5	1	3	2	1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2014澳门）	22	16	25	9	4	6	3	2	0	4	0	0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2015厦门）	26	21	31	4	12	6	0	3	1	4	2	3
世界闽南文化论坛（2016马六甲）	12	18	6	1	20	4	0	2	0	3	4	2
合计	101	80	107	34	43	39	5	12	7	14	10	6
海丝文化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39	31	13	7	12	3	3	0	1	0	1	2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18	38	14	2	2				1			
合计	57	69	27	9	14	3	3		2		1	2
总计	382	347	394	140	61	116	44	37	34	42	27	19

从对表 1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若干问题来。例如，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仍然超过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广大闽南人民所展开的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关注的研究还是很少。还有，我们的学科意识还很薄弱，学科的理论建设可以说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如果再深入到每一篇研究论文的内容，我们会发现，重复研究占了相当的比例。当然，虽然有许多不足、许多问题，但可以肯定地说，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研究取得了全面的、历史性的突破，站到了新的台阶。

关于过去 18 年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本来是应当有专门的研讨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来展开的。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原因，只能留待以后继续。不过从宏观的层面，新世纪以来闽南文化的回顾，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从 80 年代重新兴起的闽南文化研究，由于受西方分科治学理念和学科体系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闽南文化，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民俗学、民间信仰、口传文学等等。总之是处于一种分散的、分门别类的，甚至是个别的研究状况。

改变这种分散状况的是两岸的形势发展，尤其是台湾分离主义势力企图把台湾的闽南文化，从整个闽南文化中割裂出去，作为文化台独的企图，引起了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持续的关注。最早是 1989 年，以萧克同志为会长的全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来到厦门召开“首届闽台文化研究会”。会议虽然冠名“闽台文化”，但实际上讨论的主要是闽南文化，第一次把闽南文化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展示，并且聚焦于闽南文化对台湾的传播、变迁与发展。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处于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当代台湾历史的转折关口。在这前后中央对台方针的“两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改变为：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后来更把“两个寄希望”变为“一个寄希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表现出中央对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预见与担忧。

整个 90 年代，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文化台独动作不断。他们提出“台语不是闽南话”，“歌仔戏是台湾的国剧，南音是台湾的国乐”等等，企图把台湾的闽南文化从整个闽南文化中割裂出去，以利于他们台独的阴谋。2000 年，陈水扁上台，更加卖力地推动文化台独。

2003 年 2 月 14 日至 16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出席在泉州召开的“中国（闽南）文化节”和闽南文化论坛，在接见论坛代表时指出：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内涵。台湾同胞祖籍地大多数在闽南，两岸地理相邻，血缘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闽南文化联系、滋养、影响着海峡两岸的同胞，2300 万台湾同胞是我们的手足兄弟。今天，海峡两岸同胞更应该继承、发展闽南文化，让这朵中华文化奇葩，在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绽放得更加绚丽光彩。²

2006 年 1 月 12 日至 16 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福建。其间，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促进闽台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说，百分之八十以上台湾居民的祖籍在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主要方言，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信仰、歌仔戏、南音等都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当中，福建要应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³

2015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台湾除了原住民，大陆去台的，以闽南地区为主，讲的就是闽南话。血缘相亲，文像相承。闽南文化作为两岸文

² 新华社福州 2003 年 2 月 16 日电。

³ 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源流》2006，第一期。

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大有文章可做。”⁴

正是在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兴风作浪文化台独的背景下，中央领导亲自推动，闽南文化的传承、发展、交流、宣传和学术研究在新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推动了闽南文化从边缘地区的边缘文化转为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正是回顾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顺应天时，问题导向，走历史要走的路，和人民一起前进，为国家贡献智慧，才能从边缘走向舞台的焦点。

从回顾引入前瞻，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形势比人强，只有充分理解当今形势，闽南文化研究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今天，时代的潮流是什么？这正是新时代闽南文化前瞻首要的思考。可以肯定，新时代的潮流，将产生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推动和引领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走向。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将更加自觉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加强调问题导向。

二、世界的潮流，推动了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四个走向。

（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推动了中国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兴盛，将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走向。

去年金砖五国厦门会晤，习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态势，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

过去五百年，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进入21世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世界经济呈现出东西平衡的趋势，标志着西方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徐徐落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已经开启。

在西方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时期，西方文化裹挟着

经济、军事的强势渗透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盛行一时，经济全球化似乎必然也要文化西方化。

文化的力量不仅自本身衍生出来，同时也要借助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力量。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优势，其基本的经济体制和规范在世界上得到了传播。他们积累了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依靠这种优势向全世界渗透和传播，成为西方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它们的文化价值就不具有这样的地位，而处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境地。

这种趋势使文化更直接地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许多国家提出“文化安全”问题，同时努力加强自己“文化主权”。

世界文化是定于一尊还是相互尊重、百花齐放、和而不同，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各种力量角力的主要焦点。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留住自己文化之根，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推动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明确宣布：坚持“所有文化同等尊严和尊重原则”，“文化多样性对于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护、促进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代人及其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背景，推动了中国地方学、区域文化学的兴起。

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国家层面“五位一体”的发展，还有各个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发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文化大传统、小传统各成体系，各有不同，但互为影响、相互吸纳，相辅相成。小传统里面的地方文化、区域文化，正是中

⁴ 央广网 2018 年 3 月 1 日。

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博”所呈现出来的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文化学、地方学研究风起云涌。从这两年的中日韩地方学研讨会和海峡两岸地方学研讨会，我们了解到，随着文化多样性理念的推广，地方学正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台湾地方学的研究相当普遍，大陆也有至少五十几个地方学在开展。北京联合大学的北京学研究基地，是首都智库重要成员，并担任中国地方学联合会轮值主席，引领推动中国地方学的发展。闽南的泉州学、金门学早几年就提出，去年厦门学也正式提出。在厦门市社科联的推动下，厦门城市学院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厦门学研究基地。将来漳州学也有可能提出来。

闽南文化有三条母亲河，即晋江、九龙江、漳江。一代代的闽南人就是吮吸着这三条母亲河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三条母亲河培育的都是闽南文化，但又有微妙的差别。至今，晋江两岸的闽南百姓看戏都看高甲戏；九龙江两岸流行的是歌仔戏；过了漳浦的盘陀岭，漳江两岸的百姓流行的是潮剧。三个剧种都是用闽南方言演唱的闽南地方戏曲，但又各有不同的声腔和程式，体现出三条河流不同的审美取向。针对三条母亲河开展不同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漳州学将来是否还会有上漳州和下漳州之分，都是可以探讨的。

当然，地方学研究一个危险，就是只顾了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看看全中国，看看全世界。这次鄂尔多斯学会提交的论文，提出了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中国地方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闽南文化研究的同志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必须在中国学的视野下，在对世界地方学研究的了解观照的前提下，来开展地方学研究、区域文化学研究；在厦漳泉金彼此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合作的前提下来开展各自的地方学研究。同时，携手推动我们共同的闽南文化、闽南学研究。虽然天南地北，但是地方学之间一定是有相同规律的，地方学学科的构建一定是可以而且必须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总之，在文化多样性的时代潮流中，在中国人民

文化自信极大提升的背景下，区域文化学、地方学的研究，一定会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一带一路的世界潮流，将推动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关注如何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根本依归，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抓手，是中国为改善全球治理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主张，正改变长期以来充斥着强权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格局。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多赢局面正在形成世界的潮流。

“一带一路”，概括起来可以称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习总书记讲，“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基础”。福建是中国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闽南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引领者和推动者。闽南人几百年来下南洋，将近 2000 万祖籍闽南的华人繁衍生息在南洋，构建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闽南文化有历史和现实的优势，需要理论的总结和引领。新时代如何用闽南文化架构起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这是我们面临的迫切的课题。

（三）世界走向海洋的潮流，将推动中国的湾区建设，推动闽南厦漳泉同城化发展，并因此而引领新时代的闽南文化学术研究更加聚焦于闽南海洋文化的经验总结和创新。发展。

当今世界，海洋占地球的面积 71%；世界的 GDP80% 产生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世界的贸易 90% 是海运。世界最发达的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现在中国正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湾区城市群建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海洋是人类当代发展的主战场、未来的新天地。人类向海洋、向港口海湾型城市的集聚和靠拢，已经成为发展大趋势。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潮流中来

思考闽南文化能做些什么？。

厦漳泉同城化发展，构建闽南金三角湾区，正是闽南人民共同的期盼。闽南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四个港口的历史：第一，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创造了许许多多彪炳于世的文化；第二，明代漳州的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迎接大航海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中国最大对外港口，创造了克拉克瓷等传播世界的文化；第三，清以后的厦门港，曾经是闽台对渡的唯一口岸，又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口，鸦片战争以后引领闽南文化现代化，培育了许多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第四，49年以后台湾的高雄港。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和台湾在30年里成为中国仅有的对外开放区域，台湾的高雄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的港口，台湾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成为20世纪下半叶“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典型。

历史说明，谁是闽南最大的港口，谁就引领闽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闽南的海洋文化、港口文化是千百年来闽南文化生生不灭的重要发展动力。2010年，厦门和漳州九个港区组成的厦门港吞吐量超过高雄港，2017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高雄港，成为世界第15大港口。厦门，又一次成为海峡两岸最大的航运中心。

在世界走向海洋，走向湾区的大趋势中，在港口引领闽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里，厦漳泉同城化发展，构建闽南金三角湾区，必将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共同的热点。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潮流将推动华侨华人的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它将引领新时代的闽南文化研究关注峇峇娘惹文化，聚焦闽南先民在历史上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经验与教训。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联合国的决议，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追求的目标。

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而首先提出这个理念的中国必须着力去研究这个课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闽南文化有先期的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启示今天。

2015年李克强总理、孟建柱、刘延东副总理先后参访马六甲，参观了郑和博物馆、马六甲朵云轩艺术馆等。李总理在郑和博物馆与华侨华裔座谈会上，提到郑和文化和峇峇娘惹文化。其后，中国驻马大使馆约见马来西亚侨生公会总会负责人，提出支持开展峇峇娘惹文化的调研。

峇峇娘惹是早期华人下南洋，落地生根，和当地的马来人结婚，结成新的家庭所生下的孩子。男孩称为峇峇，女孩称为娘惹，实际上是早期闽南人对父亲和母亲的称呼。他们一代代在南洋繁衍，既保留了中华文化、闽南文化的许多习俗和理念，也保留了马来人许多风俗习惯，成为一群跨文化，跨血缘，跨地域，跨国度相互融合的区域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峇峇娘惹文化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下南洋进程中，朴素的文化自觉，开放包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中马文化相互包容、融合发展、美美与共的文化典型；是华人，尤其是闽南人与马来人在历史上的海丝进程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创造意义，对今天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具有特殊的启示和价值，有深刻的历史借鉴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对峇峇娘惹文化的认识不足，影响了

对该文化的深入研究。阶级斗争的观念、新侨和老侨的矛盾，也影响了国内华侨研究中对峇峇娘惹文化的研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马来西亚侨生公会总会作为马来西亚峇峇娘惹族群的社会团体，义不容辞承担起大使馆支持的这项研究。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和马来西亚侨生公会总会在2015年首届马六甲海丝文化论坛上签约结为友好协会，因此，也地积极参与此项调研，一起举办了两届峇峇娘惹文化研习营。

峇峇娘惹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潮流所提出来的课题，需要长期持续研究，必须有长计划和短安排。必须动员中、马、新、菲、印尼等更多国家的研究力量，首先是我们闽南文化的研究力量投入这项工作。我相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潮流中，在中央和各级领导的推动下，这个课题，将会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

三、中国的潮流将推动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三个走向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必将推动祖国的完全统一。在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中，闽南文化负有特殊的、不可推卸的历史担当。两岸如何在共同传承保护研究发展闽南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了解、理解、谅解、化解，最后达成两岸和解，必将成为新时代闽南文化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

两岸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的潮流与机遇，我们要牢牢把握。习总书记提出，“闽南文化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大有文章可做”，是给我们出题目、出问题，文章要靠我们所有的闽南人，所有的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和同志们一起来做。当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们做得好不好呢？从台湾的现状来看，特别是台湾分离主义在年轻人的传播，我们并没有完全尽到责任，还有许多文章是我们可以做，而没有很好去做。新时代在对台文化交流合作中、在争取台湾民心工作中，如何更全面、

更深入地发挥闽南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写好闽南文化这篇大文章，必将是闽南文化研究首要和重要的课题。

（二）中国创新的潮流必将推动新时代的闽南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闽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18年两会，习总书记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五大发展理念，第一是创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必将推动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重心从更多对历史的研究，转向更多地关注当下的创新与创造，即闽南文化的当代性研究。

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世界的潮流。有四个层面的融合发展。第一是世界文化层面上，要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各美其美，还要美人之美，实现美美与共。第二是中华文化层面，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地方的文化应当相互学习彼此融合创新，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第三，六个闽南的文化，本土闽南、对岸闽南、南洋闽南、港澳闽南、欧美闽南、外地闽南，还有厦漳泉金之间，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协同发展。文化的融合创新，在厦门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例如厦门的第一小吃沙茶面，那是我们先人把南洋的沙茶和闽南的水面融合创新，创造出来的。还有嘉庚建筑，是嘉庚先生从南洋把西方的建筑带回来，和闽南红砖大厝相融合创造出来的。第四个层面，是文化与旅游、教育、金融、科技、商业、工业、互联网等等各行各业的融合。

可以说，融合发展是创新的诀窍。因为，人即文化，文化即人。没有万寿无疆的人，只有生生不灭，代代相承。所以不肖有三，无后为大。文化也是如此。我们说中国戏曲不会灭亡。但谁见过最早的南戏呢，他死了，可是生下了元杂剧。元杂剧关汉卿，多么出色的剧本，但今天谁见过元杂剧的演出呢？他也死了，但是他生下了明传奇，明传奇又生下了清中叶以后大量的地方戏曲。现在统计有340多剧种。一代有一代人的戏曲，一代有一代人的创造。100年前没有歌仔戏，

200年前没有高甲戏，是我们先人因应时代的伟大创造。

跟着时代前进，不断创新创造，不断融合发展、生育后代，这是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的伟大智慧。如何生生不灭、融合发展，必将是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文化创造力，正在推动创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个潮流必将推动新时代闽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有中国的学术体系支撑，而中国的学术体系，又必须有中国的学科体系支撑。但是一百多年来学习西方，照搬西方，我们现在大学的学科体系，都是以西方分科治学的理念来建设的。比如我们的国学，本来是文史哲不分，但现在被切割成中文系、历史系、中国哲学系。这样一种西方的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是难于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建构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首先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做起。

西方学科分类方法有科学的宝贵的东西，对我们一百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居功阙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不断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我们自己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好东西，完全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

个整体，所谓家庭、家族、家乡、家国。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唱作念打”不是孤立的，“望闻问切”不是孤立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西方的学科分类当然也是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学设置的西方学科系统很纯粹、很单一。但是，这种学科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还能传承中国的思维方式、学术理念吗？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事物的平衡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所谓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只要有常识的人，都了解事物的平衡只有相对平衡、动态平衡。

近100年来，我们学习西方，按照西方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但现在西方的学术界，特别自然科学方面开始也关注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中国的国粹，戏曲、中医、国学、方志等等都是综合系统的。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学科，更有几千年积淀的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即使没有西方学术界的这一变动，丢掉中国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也是需要我们很好反思的。

现在找不到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学科。综合性

的地方学、区域文化学在以西方学科体系建立的大学里是找不到位置的，当然也进不了大学殿堂。即使进来，也不能毕业。闽南师范大学的闽南文化研究生毕业以后，人事局不批准，没有这种学科。

当然，找不到学科的原因，不能赖别人，首先是我们自己缺乏“中学”学科体系建设意识，缺乏学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我们的文化自信依然还停留在宣示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学术体系的自信和学科体系的自信。没有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就谈不上真正的中华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 517 讲话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

地方学由于属于小传统的学术范畴，因此基本上还未受到西方分科治学的学科体系的染指。这正可能是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突破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地方学学科的建设，来探索以中国系统性、综合性思维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综合性学科体系。

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不是大学学科的建立，那是教育部的事，而且只能是在学科理论建设成熟之后。

地方学学者的责任首先是把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和自信建立在自知的基础上，认真地向传统学习，重新研究、认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学术体系。问题是创建新学科的导向。找不到学科、找不到标准、找不到概念，正是我们的起点。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必须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综合性系统性特点出发，推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探索与建构，重建中国学科的分类方法、学科标准、概念体系。

当然，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完全一致的学科体系不可能立等可取，甚至由于文化本身的创新发展，可能永远都难于达成一致。它就像真理，我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认识它、追求它、逼近它，但永远没有终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正是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习近平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让我们共同努力，走进伟大的新时代。

挖掘地名文化资源 深入开拓地方学研究领域 ——基于张家口地名文化案例

文 | 李殿光¹

摘要

本文认为地名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支脉，内涵丰富，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开展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对拓展地方学研究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地名文化 地方学 研究

地名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先民们的世代相传，是当代有较强生命力的本土文化，展示着一个地方独特的光彩和魅力。“回顾来时路，何处寻乡愁？”几千年的岁月流逝，世代沿袭相传的地名，是“家”的方向，也是“族”的象征。张家口山河壮美、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名，有的是农耕文化的结晶，有的是游牧文化的产物，有的是移民文化的硕果，有的是军屯边塞文化的遗存，……这些地名不仅承载了农耕民族的传统文化，还记载了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张家口大地的历史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张家口地方历史文化的缩影。所以，张家口市域内的地名作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移民文化等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张家口人现实的方向，亦是心灵的归宿。按照中央提出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通过挖掘张家口地名文化资源，开展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展示，拓展张家口地方学研究新领域，旨在传承张家口历史文化，彰显张家口文化的软实力，提升张家口的文化品位，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文化保

障。

一、地名文化与地方学的内涵及意义

（一）地名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会根据自己的观察、认知和生产、生活需要，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人文地理或自然地理实体冠以共同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代号。这些代号就是地名。地名作为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不但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而且展现出一定地域的文化内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由地名的组成要素、内涵及地名的产生、演变、传承历史等内容构成的地名文化，是一门地域性强、综合多种文化资源的特色文化。在其产生、演变、传播过程中，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也承载了一个地区丰富的自然、社会、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宗教、种族等方面的信息。所以，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地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地名文化资源，开展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拓展地方学研究领域，构建地方学学科体系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性文化工程，对传承和弘扬张家口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张家口地处塞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连西出、纵贯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也创建了丰富的地名文化。境内的汉语地名，主要受农耕文化、移民文化、民俗文化等诸多传统文化的影

¹ 作者简介 李殿光 1960年12月生，男，河北康保县人，研究生学历，张家口晋察冀边区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地方历史文化。

响,出现了以自然地理实体、人文地理命名的汉语地名,以及由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或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组合命名的汉语地名。这些汉语地名用词简明通俗、内涵丰富,乡土气息浓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汉族人的农耕文化、宗族文化等状况,也承载着汉族人生产、生活史实,以及历史文化信息。市域内的蒙语地名,主要是根据蒙古族语音起名,而用汉语文字记录下来地名。这些地名有据蒙民生产、生活相关信息命名的蒙语地名,有以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蒙语地名,也有蒙汉语组合地名,是蒙古族人为特定地域所约定的专用名称;具有用词朴素、简明扼要、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富有哲理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蒙古族人的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等状况,也承载着蒙古族人居时留下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张家口地名文化是历史变迁的记录,记载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社会变迁的写照,记录了这个地区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承载了丰厚的文化,是这个地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语言发展的产物,存留着这个地区丰富的方言;是张家口的地理标签,成为这个地区整体形象的文化品牌。以至张家口市域内的地名代代相因,有名可循,有史可考,且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地名文化的代表。

(二) 地方学的内涵及其意义

地方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一个特定区域社会、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变化的学问。“地方学是一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科,是多学科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还不够成熟,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独立设置‘地方学’学科”²。时下,是以文化为引领的时代。地方学作为一个新型的学科,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特别是文化产业呈现旺盛的发展势头,其重要性也将日渐凸现出来。另外,地方学担负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学术重任,也对经济社

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和资政育民的指导意义。从内涵上看,“现代地方学,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是根据区域划分学科,时间与空间相结合,天、地、人统筹兼顾,以某个地方为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将其作为人文、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地域综合体进行综合性研究。与其他研究地方的单一学科相比,地方学研究某个地方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有着综合性、历史性和地域文化的视角”³。通俗地理解地方学涵盖面广、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从社会层面讲,研究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从纵向上讲既研究历史,也关注现实和未来。“可以说,地方学研究是连接历史与未来、地方与世界、时间与空间、理论与实践、自然与社会、宏观与微观、单体与整体的一门学科,所以它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地方性、世界性、理论性、现实性、综合性、整体性、多学科性等许多特性”⁴。总之,地方学研究的对象或范围没有脱离特定的地域,总是围绕着一个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挖掘、分析、梳理、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应运而生的地域文化研究,进入学科建设的新阶段;地方学脱颖而出,也成为必然;必将发展成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学科。

二、张家口地名文化的主要特色和比较优势

张家口历史文化发祥比较早,泥河湾不但有200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也有距今100万年、10万年、1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址,系统展现了人类在这片土地生息繁衍的历史,证实了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的史实。蔚县、怀来、赤城、尚义、康保等县境内还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别属于仰韶、龙山、红山、细石器文化类型。这些考古物证说明,新石器时期人

2 张宝秀、成志芬、张妙弟:《地方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载《北京学研究(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3-4页。

3 张宝秀、成志芬、张妙弟:《地方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载《北京学研究(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4页。

4 张宝秀、成志芬、张妙弟:《地方学的地方性与世界性》载《北京学研究(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4页。

类祖先就生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特别是中华三祖的黄帝、炎帝和蚩尤，大约在 4700 年前，先后来到涿鹿一带，共同生息、战斗，创造了“千古文明开涿鹿”的辉煌业绩，形成了以部族融合、文化融合为特征的“合符文化”。据史书记载，黄帝在涿鹿合符釜山后，就在涿鹿山旁的平地上建了一座都城，即“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县黄帝城可能属张家口市域内有人类居住，并有历史遗址的早期聚落，可惜远古时代的地名，迄今已无从考察了。

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考证，张家口地名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是历史上人类在大自然中拓荒足迹的反映，又是战乱、迁徙、民族融合的写照。历史上随着疆域的易主、王朝的更迭、民族的迁徙，张家口市域内的地名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由此承载了燕赵文化、边塞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民俗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所以，张家口的地名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先民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

首先，是民族融合的见证。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张家口地处塞外，正处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之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先后属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的势力范围，这些游牧民族都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与汉族人在张家口境内长期共处，相互影响、渗透、融合、同化，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张家口缘此曾步入繁盛时期，形成了众多的聚落，也留下了众多少数民族地名。这样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产生的地名，自然带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民族特点。赤城县茨子营（原名黑达营），是元朝蒙古族鞑靼部人居住此地建村，时称黑达营，后改现名。尚义县勿乱沟，是清朝雍正十三年蒙古族入建村，称勿拉沟（意即红沟），后演变称勿乱沟。赤城县巴图营，清朝年间，满族东翼镶黄旗在此屯兵，称巴图（满语：勇士之意）营，沿用至今。这些地名伴随着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或驻军而产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语、满语地名，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其次，是历史文化的遗存。张家口境内的地名，或诞生于移民，或诞生于屯垦，或诞生于邮驿，……

林林总总，来源不一。每一个传统地名都有鲜明的特色，存留着当地的农耕文化、移民文化、边塞文化等传统文化，较完整地体现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是活着的人文遗产。其背后都有一段有待破解的历史密码，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诸如体现邮驿文化的地名有：怀来县的鸡鸣驿属我国古代北方的主要驿站，张北县的东营盘（原称头台）、二台背（原称二台）、大土城子村（原称三台），尚义县的四台、五台村，清朝年间就属北京通往乌里雅苏台的台站所在地。体现移民文化的地名有：涿鹿县的五堡、六堡、七堡、杨家屯等村落，是明朝初年的移民村落。桑干河、洋河、壶流河流域的阳原、涿鹿、宣化、蔚县等地是先民们较早定居之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考证，蔚县境内的黄沟、娘子城、独树、大德庄属春秋战国时期所建村庄的地名；涿鹿县境内佐卫、杨木林、黄土坡、瓦子蓬等属战国时期所建村庄的地名……。这些地名属张家口境内古老的地名，分布于不同地域，特色鲜明，有长达近 2000 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这些古老的地名中，能够进一步探寻一个地方建置历史、风俗民情等人文历史状况。

第三，是一个地域宗族文化的见证。地名的产生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可以说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地名。根据目前认定古老地名的诞生年代、组成要素等，还可窥见地名中蕴含着人们的宗族情况。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血缘关系，古代的宗法制、分封制都体现了浓郁的宗族色彩。故以姓氏、姓名命名地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格式一般为“×（某）庄”、“××（某某）村”，既记载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也彰显着家族在一个地方的势力。可以说，分布于张家口市域内反映宗族文化的地名，记录和反映着张家口历史文脉的延续，传承着先民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维系着张家口的根。

第四，部分地名方言色彩较浓，成为一个地域方言的载体。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也称地方语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地方的土话。一个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必然会在这个地区的方言词汇里留下痕迹，作为词汇的一部分，地名也同样如此。张家口市坝上高原，虽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发，仍偏僻闭塞，特定的地域环境，人们发音

往往拙笨、硬涩，用口语表述时，往往出现变异，形成特有的坝上方言。坝上方言，基本上以晋北、冀北口音为主，并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文化元素沉淀渗入。由于人们“因声起意”的自由理解和方言读音上的差异，致使坝上的地名带有浓厚的方言色彩。郝家营是地名，郝：普通话读 hǎo，坝上人用方言读 hè。戈家营是地名，戈：普通话读 gē，坝上人用方言读 guō。大圪圖、马圪圖是地名，圪圖普通话读 kū lūe（当地人又书写为圪囡，普通话读 hú lūe），坝上方言读 ku lūan，其意指蒙古族人用石头或夯土、挖沟堆土垒的围墙。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地名作为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和具体地方的指称，张家口境内就有许多方言词语地名或用方言读音的地名。因此，聚落地名中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也有其特殊性，受其影响地名具有简约质朴、乡土气息浓郁的特点。

第五、地域特色明显。地名是一个地方的语言、文字代号，作为具体地域指称，不仅是区域内语言、民俗、历史等人文环境的产物，也受地形、地貌、植被等诸多自然环境的影响，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自然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人们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地名，也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地貌特征或植物命名的地名，是传统地名命名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山”、“沟”等地理实体命名的地名，如叠不齐、小东沟等；以植物命名的地名，如马莲滩、黄花洼等。所以，通过挖掘地名文化，考证地名的起源及演变历史，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个地方以往的地理、水文、生物（植物）等自然环境，也可考证一个地方地理环境的变迁。

第六、传统地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众多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而产生的，可以说地名是最古老的文化，是聚落发源的可靠凭证。如阳原县开阳堡、蔚县西古堡，涿鹿县境内有与黄帝、炎帝和蚩尤史事传说一致的村落地名——七旗村、八卦村、白草村，还有蚩尤寨、蚩尤泉、蚩尤坟等地名，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史考”价值。这些地名

向人们提供着张家口人迁徙、繁衍生息等人文历史信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张家口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保护好这些传统地名就是为子孙后代保护了民间文化，留住了历史记忆，也为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留住了美丽的生活空间和精神家园。

第七、历史延续性好。张家口地域从明朝年间修志始，至今已有近 500 年的时间，期间各级地方政府分别出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志，其中就记载了市域内众多的地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家口市（地区）、县（区）两级政府组织人员专门收集聚落地名、政区地名等地名资料，并编印了《地名资料汇编》，个别县区还出版了地名志等，为地名的传承做了较好的基础工作。另外，市域内至今还保存着历史上各个朝代较多的地名，并仍在沿用。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一个地名的诞生、嬗变与存留，往往都蕴含着人文、历史、地理、政治等多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人们将丰厚的文化内涵赋予其中，每一个地名无不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因此，张家口市域内的地名是我国众多地名的缩影，也是我国北方地名文化的代表，其中蕴藏着大量的信息资源，保护传承张家口地名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民俗研究价值，对于开拓地方学研究领域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张家口地方学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研究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的学问，古已有之，历史悠久。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的地方志，已有 2000 多年历史，以人物游记、杂记的形式，记述一个地域的历史更是历代不绝。目前，张家口虽然没有正式提出张家口地方学这一研究课题，但古代先贤已做了大量奠基工作。张家口最早的方志当属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0 年），王崇献纂修的《宣府镇志》（明朝正德刻本），以后相继出版的各种方志有：尹耕纂修：《两镇三关通志》（明朝嘉靖年间刻本），

孙世芳修、栾尚约纂：《宣府镇志》（明嘉靖四十年刻本），李英纂修：《蔚县志》（清顺治十六年刻本），于成龙修、郭棻纂：《畿辅通志》（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陈坦纂修：《宣化县志》（清康熙五十年刻本），黄可润纂修：《口北三厅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宋哲元修、梁建章纂：《察哈尔通志》（民国二十三年刊行），陈继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等各种志书计 51 种⁵。

盛世修志。1984 年，张家口市（地区）政府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方志办公室，各县区政府也相应成立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地方志办公室，市（地区）县（区）两级着手组织人员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修地方志的序幕。经过广大方志人员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市及各县区均正式出版了当地的方志。主要成果有：《张家口市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 年 8 月）、《康保县志》（新华出版社出版，1991 年 2 月）、《赤城县志》（改革出版社出版，1992 年 8 月）等一大批地方志书。一些地方还出版了行业志书，如《张北县卫生志》、《蔚县卫生志》、《康保县卫生志》等，填补了行业志的空白。同时，张家口市（地区）及各县区政府还成立了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着手普查并规范当地地名，各县区均编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地名资料汇编”，如《蔚县地名资料汇编》《崇礼县地名资料汇编》等，部分县区还出版了“地名志”，如《康保县地名志》（李绍康主编，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 5 月）等。这些地方志、地名志极大地丰富了张家口地方学。

近些年，张家口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在一些有识之士倡导下，地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市县各级地方历史文化学会（研究会）、各类社会学科学会（研究会或研究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共同开展多学科学术研究，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003 年 12 月 24 日，张家口市成立了张家口泥河湾历史文化研究会，吸纳会员单位 10 个，发展会员 110 名，编辑出版了《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会刊，迄今已编印了 17 期。赤城县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成立了赤城县历史文化研

究会，并出版会刊《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刊。2014 年 1 月，察哈尔文化研究会成立……。这些团队旗下集聚了一大批学者或地方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们潜心研究著述，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诸如安俊杰：《细说张家口》（线装书局出版，2013 年 1 月），韩祥瑞、陈韶旭主编《张家口百年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12 年 3 月），刘振英主编：《品评张库大道》（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2012 年），刘登海：《赤城史话——兼谈赤城县地名文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等一大批地方学方面的专著，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现出张家口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文化特色，奠定了地方学研究的基础。

同时，也应看到，张家口地方学的研究与发达地区相比，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地方学研究相对滞后，大多数集中在个案的研究或探讨中，部分学科学术性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化、概念化状态；而纵向地、贯通地审视研究历史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著述相对薄弱；现阶段受研究人员的学术能力和研究力量的限制，未能达到博而精的水平，还没有形成地方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地方学科建设滞后；地方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显得乏力；地名文化等学科，还处于待开发的处女地。

四、以地名文化研究为切入点，开拓地方学研究领域

地名文化是地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草根文化的地名文化，在一个地域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延续力。所以，在地方学视野下的地名文化研究与一般的专题文化研究不同，其显著特点是既关注当下的地名文化的形态，也关注地名文化的产生、嬗变、传承与未来发展。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说：“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因为地名本身就是词汇的组成部分，并且地名往往能提供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⁶。就张家口市域内的地名而言，既承载了厚重的边塞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传统文化，也记述着张家口各个历

5 杨润平、张连仲、颜诚：《〈宣化府志〉导读》宣化区档案史志局，2012 年 7 月，第 177 ~ 182 页。

6 帕尔默：《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 年。

史时期的信息，从中可以说明或证实许多历史问题，对于研究张家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颇有助益。

同时，历史上的张家口从军事要塞、中原屏障、陆路商阜、到雄踞塞外的重镇，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挖掘其地域文化，建立张家口地方学有雄厚的基础。目前，张家口正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北京携手承办2022年奥运会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因此，以地名文化研究为切入点，从中总结经验，提供丰富的个案研究成果，为拓展地方学新领域奠定基础，也势在必行。

（一）收集地名基础资料

目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一些聚落地名正在消失；有的地方随意更改地名，导致地名混乱；既影响了地名文化的传承，也隔断了地方的历史。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认识张家口地名文化的历史价值，吁请人们传承好、保护好地名，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望。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从普查地名资料入手，认真开展地名文化资源的调查、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地名数据库，为地名文化研究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同时，通过建立地名数据库，也为抢救地名文化，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二）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开展研究

我国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既是重要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地名文化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最能代表地域文化特色的地名。挖掘张家口境内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名文化，进行重点研究，以此丰富地方学研究的内涵。诸如对分布在张家口境内的青边口、李信屯等带有军事意义的地名，开展重点研究，极具代表性。张家口地处塞外，境内有战国时期的燕、赵长城，也有汉、北魏、北齐、唐、金、明朝的历代长城，证实我国古代历史上，张家口地域是防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屏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原地区的政权常将这里作为拱卫京师，屏蔽中原的战略要地，而入主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则将这里作为统治中原的“腹里”之地。以至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战争，金戈铁马、古道沙场，在张家口境内造就了许多营盘或城堡，以后逐

渐形成或演变为居民聚落，形成具有军事意义的地名。通过这些地名，研究张家口的边塞文化及军事史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加强地名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探索和把握张家口地名文化的内在规律，阐述地名文化的内涵和特征，也是应有之重点。学习借鉴国内外地名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地名资料进行分类筛选和综合，写出专题论文，填充地名文化研究的空白，使地名文化研究接地气、聚人气、见实效，利用地名打造地域文化品牌。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系统工程，离不开多学科联合攻关。地名文化作为一个学术体系，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深入挖掘地名的起源、词语特征、语义演变、分布规律等；专题研究地名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地名文化的门类结构、地名文化的区域分布、地名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推进地方学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坚持科学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多角度对张家口地名文化总体脉络进行梳理和系统研究，揭示出内在的规律，廓清思路，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现张家口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

（四）全面系统展示地名文化成果

通过挖掘整理地名资料，对地名文化进行多学科重点研究，编纂出版《张家口传统村落地名》《张家口地名志》《张家口地名文化研究》《张家口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张家口古今地名对照表》《张家口地名文化解读》《张家口地名史话》等地名文化系列丛书，拍摄制作地名文化专题影像片，建立地名文化网站，全面记录和展示各类地名的文化，以此丰富张家口市的地情资料，增强全市的文化软实力。

总之，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需从自身特点出发；选择一个角度，去研究它、突破它，或从子系统入手，由个别探讨整体，最后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构建学科体系。地名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支脉，内涵丰富，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对拓展地方学研究领域，有着无可替代的功能或积极的推动作用。

徽学研究中心简讯

范金民做客“徽学论坛”2018年第八讲

9月21日下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举办“徽学论坛”2018年第八讲，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范金民先生作了题为《制度与惯例：清代江南文书研究三题》的学术报告。

范金民教授分“从草议到正契”“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从世袭到顶首”3个专题，讲授解读文书的路径与方法，展示清代江南房地产文书和书吏顶首文书的详细情况，强调历史研究中制度、惯例与实态结合考察的重要性。徽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生和安徽大学其他院系师生聆听了讲座，部分师生就关心的学术问题与范教授进行交流。

在讲座之前，范教授与徽学研究中心全体研究人员座谈，结合自身经历就教学、科研等问题提出宝贵意见。

栾成显做客“徽学论坛”2018年第九讲

10月15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年第九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305教室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栾成显作《徽学研究大有可为》学术讲座。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主持会议，徽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全体研究生及其他院系部分师生到场聆听。

栾成显研究员从“徽州文书资料遗存”“徽州乡邦文献”“徽州文物系统”三个方面阐述了徽学研究大有可为的原因，通过与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等文书的比较，并结合自身考察调研经验，从数量、种类

和质量上对徽州文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师生互动环节，栾成显研究员结合自身多年研究心得，着重回答了“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一问题，他指出研究题目要有可持续性，要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内容，选定方向后要打阵地战，深入钻研，做深做透。最后，栾成显研究员以“致广大而尽精微”寄语在座的青年教师及学生，希望大家在各自研究领域都有所收获与成就。

周晓光教授主持并总结了本场报告会，认为栾成显研究员的讲座有温度、有宽度、有深度、有高度，为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对大家的治学科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松浦章做客2018年“徽学论坛”第十讲

10月17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年第十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305教室举行。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客员研究员、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松浦章做了题为“清代东亚海域交流史”的学术报告。

松浦先生认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颁布“展海令”后，中国沿海民众积极开展对外航海活动。当时中国的帆船航行于日本、东南亚海域，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清代四大帆船的沙船、鸟船、福船、广船中，尤以鸟船擅长远洋航行，航线延伸至日本及东南亚，在清代东亚、东南亚海域的人口流动和物资交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教授与部分教师、研究生共三十余人聆听了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会后松浦先生与在座师生就研究选题、学术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周绍明做客 2018 年“徽学论坛”第十一讲

10 月 23 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 年第十一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 305 教室举行。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周绍明教授(Joseph P. McDermott)做了题为“The Uses of Ancestral Halls in Huizhou(徽州祠堂的作用)”的学术报告。

周教授指出,自嘉靖十五年(1536)明世宗批准礼部尚书夏言的奏疏,允许民间自建宗祠祭祖之后,徽州建祠之风大盛。明清时期徽州宗祠数量巨大,且一村拥有多座祠堂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建祠所需的巨额费用,成为徽州宗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徽州宗族筹集建祠费用的方式很多,包括人头费、商宦捐输、神主费、添丁钱诸多名目。对于筹集的资金,除了用于祠堂的建设、维修以及置办祭田、纂修谱牒外,徽州宗族会成立各种类型的“钱会”组织,将资金用于开设商铺、典当铺、贷给商人作为资本等方式保值增值。

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中生研究员与部分教师、研究生共三十余人聆听了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周绍明先生与在座师生就徽州宗族的性质、徽州民间借贷利率的高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山本英史做客 2018 年“徽学论坛”第十二讲

11 月 12 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 年第十二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 305 教室举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讲座教授山本英史先生做了题为“传统中国的陋俗改革——以溺女为中心”的学术报告。

山本教授认为,溺女习俗是根深蒂固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陋习”,其原因包括贫困导致难以抚养、厚嫁之风、重男轻女的观念等。历代王朝虽曾不断颁布溺女禁令,但这些禁令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历代

王朝既无太大兴趣通过法制来规制溺女问题,也无渗透至基层社会的强大权力彻底落实禁令。因此,采取各种方法预防民众的溺女行为遂成为历代王朝的不二之选。这些方法包括起进行启蒙说谕、开展福利事业和宣传因果报应等。不过,山本教授指出,这些预防措施也无足够的效果,溺女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完全解决。

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徽学中心及历史系部分教师、研究生共五十余人聆听了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山本教授与在座师生围绕溺女行为的地区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郭琦涛做客“徽学论坛”2018 年第十三讲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 年第十三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 305 教室举行,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郭琦涛教授做了题为《族望与神权:程敏政与明朝中叶徽州的宗族文化》的学术报告,本次学术报告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中生研究员主持。

郭琦涛教授以《新安名族志》等为中心,认为徽州的名族志搜集全府县所有的名族及其支裔,不仅提升了徽州名族的集体荣耀,其实也是名门大族排定权势次序,并进而达成某种权力均衡的工具和载体。《祈神奏格》中富有创意的安排不仅突出了汪华的神权,还在于把程灵洗作为汪华的随从偷偷放入广为使用的祭祀神谱,更在于把这种神谱安排公然推给程敏政。在树立徽州族统与神权的两方面中,程敏政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者出于本意,后者出自他人之手,借其名号达成两者之间的平衡和宗族社会的和谐。

讲座结束后,郭琦涛教授与徽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研究生等就徽州宗族社会、徽学研究的其他层面等进行了深入的互动。

朱万曙做客“徽学论坛”2018 年第十四讲

11月15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年第十四讲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305教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教授做了题为“集部与徽学研究”的学术报告。

朱教授认为,徽学之所以能成“学”,除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外,更基于大量历史文献的留存,这些文献大致包括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两大部分。与契约文书相比,目前学界对于历史上徽州典籍文献的关注与研究稍显逊色。朱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指出,典籍文献尤其是集部文献,既有徽州历史文化的撰载与记忆,又有徽州地域文化的记载与反应。深入解读集部文献,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徽州历史上的人与事有清晰了解,更可借此深入徽人的生活世界,探寻其内心深处的精神与情感。

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中生研究员主持了此次讲座,徽学中心及安徽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研究生四十余人聆听了这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朱教授与在座师生就文化徽州的形成、徽人自我认同的产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世华做客“徽学论坛”2018年第十五讲

11月28日下午,“徽学论坛”2018年第十五讲

在安徽大学问津楼北305教室举行,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王世华以“文化在徽商兴起中的作用”为题做讲座。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晓光主持讲座,徽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全体研究生及其他院系部分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王世华教授抛出“徽州这样‘民鲜田畴’的地方不在少数,但为什么没有兴起一个全国著名的大商帮”,“为什么徽州人能够‘不辞万里游,持筹偏九州’”两个提问,引发了在座师生的思考。而后,王教授提出“文化是徽商兴起的力量”这一观点,并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在徽商兴起中的作用:一、观念的解放是徽人走出深山的重要推动力量;二、“能寒暑,恶衣食”的山民品格铸就了徽人的创业精神;三、宗族文化成为徽商成帮的粘合剂;四、较高的文化素质助推徽商走向成功;五、文化帮助徽商创建了灵活的商业制度。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就文化与徽商衰落之间的关联、中西方市场环境 with 商业发展的异同等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徽学研究中心官网: <http://www.huixue.org/>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简讯

在康巴什召开库布其历史与文化座谈会

10月11日，由鄂尔多斯市社科联、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主办，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承办的库布其历史与文化研讨会在康巴什召开。会议旨在讨论如何充分发挥地区文化优势，全面推进库布其文化建设，进一步挖掘库布其历史文化资源，为树立一个地区标志，打造一个文化品牌，恢复一个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文化灵魂的内涵，塑造一个精神动力。

参加会议的领导有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曦，鄂尔多斯市社科联主席李洪波，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副院长何鹏，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副院长陶文辉、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奇海林、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勇以及研究会的部分专家理事、专家等3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议由杨勇主持，专家委员会主任奇海林作了总结。各位专家围绕库布其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挖掘、调查、研究、宣传进行了深入探讨，意在进一步开展系统化、规模化、科学化的研究，为库布其学术理论研究、政府决策咨询、文化旅游建设、地方品牌宣传作出应有的贡献。

各位专家一致认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库布其历史文化的研究选题非常好，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学术研究的范畴，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放大库布其历史文化的概念，加强内涵与外延的研究，把落脚点放在应用服务上，为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强学术调查和抢救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民族文化的研究，厘清库布其文化的脉络，把“库

布其模式”上升为“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形成国家和自治区重点文化课题，产生出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一个地区的发展要有文脉支撑，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力量，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党校、大学进行学术支撑，做好理论研究这篇大的文章，使鄂尔多斯学研究真正做到理论研究+应用服务。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

12月20日上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四届三次理事（扩大）会召开。会议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勇主持。会上讨论通过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8年工作总结》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19年工作要点》。同时新吸收阿希达等14人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员、聘请李怀景等7人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了何鹏等4人为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奇·朝鲁荣誉会长在会上讲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是要对鄂尔多斯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继续下功夫，二是鄂尔多斯学+应用服务在实践要继续用在实处，努力把鄂尔多斯学打造成品牌地方学。奇海林主任在总结中讲到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改革开放的产物，继续发挥好理论支撑的作用，未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要不断的磨炼，继续发挥作用，在应用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多出成果，利用好这个平台，发挥好鄂尔多斯学+应用服

务的作用。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其他简讯

12月24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勇和副会长王春霞先后来到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分别就鄂尔多斯走进大学2019年的主要工作与相关领导进行沟通交流。

12月27日，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协助拍摄、常务副会长杨勇策划并担任文化顾问的微电影《禄马风》问世。该片讲述了一位65岁的牧马人从放马到马文化的传承，印证了时代的变迁。他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更是伊金霍洛各族儿女的真实写照。他们发扬吃苦耐

劳、忠诚担当的蒙古马精神，奏效了改革开放40年的最强音。全片长13分钟。

12月28日，内蒙古自治区社科理论界召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研讨会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社科院、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承办。本次会议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媒体记者150余人参加了会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参加了会议。

来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官网：<http://www.ordosxue.cn/index.html>



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8 大事记

2018 是坚守与努力的一年。不畏困苦，励志前行，在学术研究方面，力求有所建树。年内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撰写《乌珠穆沁文化是游牧文明的瑰宝》、《元上都遗址的历史价值和上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忽必烈时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汇》、《忽必烈多元一体开放的经济思想和实践》等多篇学术论文。参加了 2018 年元上都暨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作研讨发言，得到广泛好评。上都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与上都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编入《地方学研究》第一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对地域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建设的阐述与探寻——以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为例》编入《地方学研究》第二辑，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补充新的力量，筹划地方文化研讨，积极争取社会支持。坚韧前行，坚守地方文化研究这方净土，不弃不离。上都文化研究走在路上。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维护和坚持了“元上都文化网”（<http://www.shdwh.cn>）运行。虽暂停数月，网站文章总数 1140，年内新增 43 篇，于 2017 年持平。《元上都文化》网站截至 12 月 31 日浏览人数 315046，年内新增 24621 人次，是上年新增人次的 16 倍还多。

1 月 30 日元上都文化网发布理事长徐进昌的文章《元代京城上都几个值得关注的表述和认知——元代历史上几个值得商榷的学术观点》。

3 月 26 日，元上都文化网转发：草原文化 | LOFTER(乐乎) - 让兴趣，更有趣。

5 月 24 日，“元上都文化”网发表甄达真 斯琴《蒙古民族谚语，风采四溢》。蒙古民族谚语是植根于蒙古民族人民中具有特色的语言之花，有着鲜明的民族性，深刻的哲理性，丰富的知识性，且又幽默风趣，辛辣有力，和蔼可亲，真好似一位年长的挚友。多情如火的谚语，源远流长，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因而久传不衰，不断丰富、提高，广泛流传。它的内容深广，研究和传播它，有利于当今的文化建设。

7 月 28 日至 29 日，2018·元上都暨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正蓝旗上都镇召开。正值金莲花盛开的季节，上都文化的发祥地——金莲川草原迎来了八方宾客。解读上都，探寻元代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徐进昌、副秘书长温茹雅、包玉瑞一行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向研讨会提交了两篇论文：徐进昌的《上都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与地方学理论框架初探》，包玉瑞的《忽必烈多元一体开放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并在研讨会作了发言。论文被选入研讨会《论文集》。正蓝旗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微信平台以“2018·元上都暨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徐进昌老师精彩发言”为题作了报道，并播了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蒙古学会正蓝旗人民政府主办，正蓝旗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承办。大会收到论文 49 篇，与会人员有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大、上海博物馆、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图书馆、赤峰学院、内蒙古艺术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嘉兴学院、黑龙江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正蓝旗各界人士代表、镶黄旗、白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日本昭和女子大学等专家学者 60 多人。

8 月 6 日，经协商研究决定，聘任郁志云为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

9 月，徐进昌、温茹雅的论文《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与上都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果》被收入《地方学研究》第一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奇·朝鲁主编。

徐进昌、闫甚普的论文《对地域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建设的阐述和探寻——以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为例》被收入《地方学研究》第二辑，表述了锡林郭勒对地域文化建设的见解。

10 月 12 日，经协商研究决定，聘任殷继红为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25 日，徐进昌 殷继

红的论文《乌珠穆沁文化是游牧文明的瑰宝》发表于《锡林郭勒日报》，全文分“乌珠穆沁文化初探”、“乌珠穆沁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遗存”、“乌珠穆沁的地域风情和文化风韵”三部分，定义并阐释了乌珠穆沁文化的概念，综述了乌珠穆沁的地域风情和文化风韵。首提乌珠穆沁文化的学术概念，以抛砖引玉。乌珠穆沁文化，是游牧文化的瑰宝，是由大草原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滋生孕育的文化。生活在乌拉盖河流域的蒙古族部落，在祖国地图雄鸡脖子的地带，逐水草而居。特殊的历史文化印记和地域风貌，在天然牧场上放牧牛群、羊群、马群的生产生活方式，独特的语言文字和风俗民情，历史悠长的长调牧歌、民族服饰、博克运动和赛马，尊崇大自然的原始生态的情怀，尊崇长生天和英雄的理念，从众和自尊同在，善于自律，好客交远，迁徙流动，和而不同，这些元素长久孕育发展和成熟，成就了这一方土地和这一群体特有的乌珠穆沁文化。

12月10日，元上都文化网在暂停四个月后重新开通。开始关了浏览量，于12月26日完全开通。据不完全统计，浏览人次已超过31万人次。文章已达1136篇。这个上都文化、蒙元文化的专业网站自2004年来，不断焕发活力，14年来已走向成熟，在文化自信的前行中贡献着力量。23日，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部分成员和相关人士举行座谈会，追忆研究会2003年成立以来的路程，面对种种困惑，展望今后的运作前景。提振信心，拓展蒙元文化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加大对乌珠穆沁文化和二连浩特口岸文化研讨，希望还在前面。陈情有关部门，致意社会层面，表述研究会的工作状态和对上都文化研究的意见、建议。28日，“元上都文化”网发表殷继红的诗篇《七百年，我遇见你》，表述了对元上都和上都文化的追忆和挚爱。一小时浏览量119，点击率创元上都文化网新高。

草原是诗，文化是魂。元上都历史文化是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十五年坚持上都文化研究，出版《上都文化研究》（蒙、汉文）、《解读上都》专著，创建“元上都文化”网站（www.shdwh.cn）和“上都文化研究”学术报，申办“上都文化”商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埋头苦干，持之以恒，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没有最起码的资金保证，工作存在多方面的困难，极其需要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如，其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第一，上都文化网站自2004年创办以来，14年坚守，浏览人次超过31万5千，文章达1140篇，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今，长期没有维护资金，已经难以为继。欲办无力，欲罢不忍，极其艰难。

第二，参加各地蒙元文化研讨和地域文化研究与地方学建设学术研讨会，是宣传元上都文化和锡林郭勒文化的重要平台，每年我们都参加一两次这类学术研讨会。也参加、参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工作。参会的车票、住宿费都要自掏腰包，没有任何运转费用。

第三，不少人下功夫写了元上都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没有任何报酬。辛辛苦苦，写出很有价值的论文，却常常徒劳无功。长此以往，伤害了上都文化研究的积极性，更难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学术队伍。

第四，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及时纠正错误的提法、说法，特别是锡盟自己的博物馆，不要长期保留错误的提法。比如，把上都竟然说成是陪都，是行宫，应该得到及早纠正。

第五，元上都遗址于2012年获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锡林郭勒的骄傲。这是内蒙古仅有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份巨大的人类精神财富，它的丰富蕴涵和难以估量的价值，需要足够的功力去探寻、追索、阐释和弘扬。这是一个文化工程，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作为一个民间文化团体，力量远远不够。

申遗成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建议盟里成立“元上都文化研究院”，打造一支自己的专业队伍。

第六，文化自信是精神文明的基石，锡林郭勒文化得天独厚，建议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元上都文化和锡林郭勒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起上都文化这面世界品牌的文化旗帜，让锡盟独特的上都文化和游牧文明成为助推锡盟经济社会强劲发展的无形力量。

一年过得真快，上都文化研究的路上，脚步没有停下。只要希望还在，锲而不舍，光辉就会在前面。我们坚守着。我们期待着。

来自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官网：<http://www.shdwh.cn/>

（本刊编辑有所修改）

“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 系列讲座课程顺利开展

继 2018 年 9 月 10 日和 14 日“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系列讲座课程第一讲和第二讲之后，9 月 17 日至 12 月 10 日课程讲座第三讲至第十六讲顺利开展，具体讲座题目、讲座专家等信息见表 1。

表 1 “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讲座课程第三讲至第十六讲一览表

序号	讲座时间	讲座题目	讲座专家	工作单位 / 职称职务
3	9 月 17 日	首都东京的巨大化与地方都市的再生——都市两极化时代中的多元文化共生	佐野充 (Mitsuru SANŌ)	日本大学文理学院教授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Nihon University/Professor)
4	10 月 8 日	澳門的開埠及其歷史作用	金国平	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 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
5	10 月 15 日	东亚远距离的漂海记录与异国文化观察	陈益源	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金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en Kung University)
6	10 月 22 日	台湾旧建筑再利用与遗产教育的地方想象	榮芳杰	台湾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副教授
7	10 月 29 日	近代文明化城市的变化和首尔贞洞	朴喜用 (Park, Hi-Yong)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Institute of Seou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eoul/Chief Researcher)
8	11 月 2 日	都市的民俗传承与现代文化——以日本城市民俗为例	何彬	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社会学部教授
9	11 月 5 日	台湾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设计路径：水沙连宜居城镇的转型与治理经验	张力亚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副教授

序号	讲座时间	讲座题目	讲座专家	工作单位 / 职称职务
10	11 月 12 日	宜蘭學－地方學與地方特色產業 Yilan Studies: Local studies and local culture industries	陈志贤	台湾佛光大学管理系（所）主任（所长）、《宜兰学》主编，副教授
11	11 月 19 日	欧亚航路之间：槟榔屿华人文化遗产之再认识	王琛发	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
12	11 月 26 日	蒙古生活方式与游牧文化变迁 (Mongolian lifestyle and nomadic culture changes)	Gerelt-Od Erdenebileg	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国际关系办公室主任、社会和人文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chool of Social And Humanity Science, Mongo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13	12 月 3 日	香港历史与文化	叶农	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澳门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4	12 月 10 日	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新意”及其对日本平城京的直接影响	王维坤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15	12 月 17 日	韩中日的文化认同和东亚共同体——文化和东亚国际合作	李奎泰 (Lee, Kyu Tae)	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for Economy and Culture in, Kanto University /Professor/Director)
16	12 月 24 日	香港地方文化——从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谈起	游子安	香港珠海学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歷史及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三讲“首都东京的巨大化与地方都市的再生——都市两极化时代中的多元文化共生”由日本富士学会理事长、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地理系佐野充(Mitsuru SANO)教授主讲。东京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超级大城市，人口超过3500万。尽管当前日本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以及由于人口减少对地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而作为日本最大的城市，日本全国的人口仍持续不断向东京聚集，东京仍然处于过度集聚和持续的“巨大化”过程中。佐野教授在讲座中，首先回顾了日本战国时代因军事防卫功能而形成的古代城市聚落的雏形“城下町”的基本特点与演变；然后介绍了产业革命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高速铁路、公路的修建，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他重点从土地利用演变、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城市空间拓展与城市多中心结构的形成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日本东京都市圈的人口和产业功能密集区，如何从20世纪60年代东京市中心外围20km圈层，向20世纪90年代东京市中心外围40km圈层，2010年以来继续向外围60-70km圈层快速扩张的过程。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五次全国国土空间规划都提出要“抑制”东京都市圈的巨大化和过度集中，然而实际上从全国人口迁移的微观过程来看，到目前为止东京都市圈还在继续集聚和增长。佐野教授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入迁出等角度详细分析了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巨大化过程和其微观动力机制，并指出与东京的巨大化相对应并存的则是地方城市人口的持续减少和地方城市的萎缩，为应对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转型与两极化发展趋势，日本国家层面制定了面向区域均衡、地方振兴的国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政策。佐野教授进一步以距东京40km、有35万人口的埼玉县川越市和距东京70km、人口约20万的神奈川县小田原市这样的地方小城市为例，介绍了日本人口在30万人及以下的地方小城市为应对人口减少趋势而开展的地方创生、地域再生计划与实践，尤其是吸引投资、创造就业、利用高科技及创新技术实现本地资源高附加值化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吸引人口、发展经济保持地方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街区与社会的活的措施。其中，他指出发展地方旅游业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第四讲“澳门、北京与美洲白银”由金国平研究员主讲。他首先回顾了澳门开埠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提出龙涎香、佛郎机铳、自鸣钟和白银是影响澳门开埠、葡萄牙殖民者进入以及澳门紧密联系北京的四个重要因素。然后，介绍了从明末开始美洲白银和银币经过澳门和马尼拉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使得北京与澳门的联系非常紧密；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全国白银的调配与流通支配权在北京。最后，提出早期通过澳门获得的白银连接了中国与世界，为中国进一步开展海外贸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一个全球一体化市场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把中国从古代带到了近代。金国平研究员从白银流入中国的视角解读了澳门与北京的历史联系，呼应了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五讲“历史地理学与地方研究”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唐晓峰教授主讲。地方学由研究特定地区的学科群构成，历史地理学是地方研究的基本学科之一。地理学观察问题的独特方法，对于地方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区域人地系统过程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而有效运用区域性、空间性、地方感等地理学概念是历史地理学在地方研究中的关键。唐晓峰教授在讲座中提出，北京学是关于北京研究的一个学科群，建立这个学术平台就是协调一个学科群。相应地，北京学研究也不是一两个学者的事情，需要一个学者群体。地方学与传统的方志学不同，方志主要是记录，而地方学还要提出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在内容的广泛性上远远超过方志学。地方学的学科群包括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建筑学、文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而历史地理学是地方学的骨干学科之一。唐晓峰教授以北京为例，从区域性、空间性、地方感三个角度讨论了历史地理学在地方研究中的特点，同时简明而系统地梳理了北京的发展史、北京不同空间的演变，并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提出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唐晓峰教授在讲座中也指出了历史地理学思考问题的独特

角度，给予现场教师和学生很大的启发。

第六讲“台湾旧建筑再利用与遗产教育的地方想象”由台湾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副教授、区域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荣芳杰主讲。荣芳杰老师从2008年由台湾高校学者与地方人士创设的“财团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发起的“老屋欣力”运动讲起。他介绍，这个运动的宗旨在于唤醒社会大众关注城市街头巷尾的老房子，该基金会鼓励市民用更积极的态度保护和利用这些老旧建筑，透过这些老屋的改造，促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荣老师通过举例老房子的改建历史，讲解其中几处老屋改造的具体过程和带来的改变及影响，说明了这个从台南开始的“老屋欣力”风潮点燃了一股台湾各地对老旧建筑活化再利用的热潮，在这种运动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对于地方知识的教育想象。荣老师在对中外遗产教育的发展现状作出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旧建筑再利用与遗产教育的地方想象是必要的，是亟待重视和推进的，并提出了发展优势和待解决的问题。

第七讲“近代文明化城市变化与贞洞”由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朴喜用（Park, Hi-Yong）主讲。权利通过建筑得以表达，建筑的变迁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朴喜用研究员围绕这个主题，从四个方面开展了讲座。首先，他以首尔的城市中心空间——贞洞为例，通过其周边历史建筑的发展，如贞洞教堂、百济学堂、旧俄罗斯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德寿宫、圜丘坛、崇礼门等，介绍了曾作为首尔传教、医疗与教育中心的贞洞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在韩国历史地理上的地位。其次，他介绍了首尔圜丘坛的建造过程、规划设计思想，以及圜丘坛与德寿宫、景福宫等建筑的空间关系。第三，介绍了明成皇后遇害后，为其进行国葬时所走之路——太平路的发展变迁。第四，从圜丘坛的毁损与朝鲜酒店的建立、朝鲜总督府的拆毁与景福宫的前景营造等方面介绍了首尔城市空间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权利变化。

第八讲“现代都市的民俗传承——以日本城市正月食俗为例”由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生导师何彬教授主讲。日本民俗学科除了具有研究

范围广、分类细致、历史色彩重、重视区域性研究、田野作业细致等学术特征之外，个人对该学科的形成和理论建树、组织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其特征之一。因此，何彬教授在讲座中首先介绍了日本民俗学学术简史和日本民俗学创立者柳田国男先生的一生足迹及其为日本民俗学做出的贡献。然后，介绍了日本明治改历与日本的主要节日，并以正月食俗为例介绍了日本年节习俗今昔状况，分析了日本传统节日在改历后的适应和变化；强调日本都市民俗的传承是乡土社会民俗的都市化，区域性民俗在城市空间延伸成各种都市民俗，区域民俗因素和共通性交织，结构出各种都市民俗，而商家在都市民俗传承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她提出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日本节日很多源于中国，但如其所是则是在日本自己土壤上重新滤过之后的结果。

第九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设计路径：水沙连宜居城镇的转型与治理经验”由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项目助理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水沙连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协力治理组组长张力亚博士主讲。台湾在经历了工业化与城市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当前城市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总人口下降等带来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尤其随着城市化进展年轻人流入城市，导致乡村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面对多元且复杂的城乡发展课题，大学与地方不同利害关系社群之间，彼此如何相互协力，开发出具备创新与正向发展能量的地方公共治理动能，继而促进城乡永续发展实践的可能性，无疑是当代城乡发展极为重要的课题。张力亚博士以台湾南投埔里镇为案例，介绍了埔里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蝴蝶和红茶等特色资源、地方特色等，将其概括为“山之城，花之都，水之乡，艺之镇，健之邑”。然而，在经历了台湾“921”大地震之后，埔里面临灾后重建的紧要任务。张力亚博士基于其所在的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水沙连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过去十几年长期的社区营造实践经验，具体介绍了从1996年设校以来，1999年“921”大地震后的社区重建、2013年的城镇垃圾与空气污染等课题与经验，暨南国际大学与埔里

镇不同的利害关系社群之间面对不同挑战课题时彼此之间相互协力的知识学习,开展各类大学协力地方治理的共学共工经验,继而带动地方事务发展,同时也触动大学的知识成长,建构起新的地方公共治理模式。

第十讲“宜兰学——地方学与地方特色产业”由台湾佛光大学管理系主任、佛光大学民宿研究中心主任陈志贤教授主讲。陈志贤教授首先介绍了宜兰学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举办的学术会议、为地方的服务等情况。其次,陈教授介绍了宜兰的地方文化。他认为,地方文化包含田园休闲、农特产品、手工艺品、文化节庆活动四个方面的内容,并分别列举了案例。如宜兰内城社区利用已经废弃的拖拉机农具让都市居民进行休闲,这就是田园休闲。如宜兰结合独特的自然环境种植金枣这种农特产品。如白米社区发展木屐手工艺品,一些社区发展稻草工艺品等。关于文化节庆活动,如头城抢孤、歌仔戏、二结王公庙过火、礁溪二龙竞渡、利泽简走尪等已经成为所举办地的名片等,以上这些都属于地方文化。第三,在第二部分内容的基础上,陈教授介绍了依据地方文化发展起来的地方特色产业。第四,陈教授对宜兰学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第十一讲“欧亚航路之间:槟榔屿华人文化遗产之再认识”由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主讲。王琛发教授指出,“槟榔屿”名称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见诸《郑和航海图》。自18世纪末起,大量华人来此生活,并努力在异地重建中华,构建起族群在地凝聚与祖籍认同。槟榔屿港口都市的华人文化遗产,包括街巷名称、建筑内容、风俗习惯等,还有主流的地方华人历史书写往往差异于前人碑铭文献,足以反映南洋先民如何长期应对外力冲突而坚守文化传承,甚至在南洋保存中国已消失的许多传统。王琛发教授展示了大量的图片,形象生动地讲述了槟榔屿华人的文化遗产,槟榔屿如何成为欧亚航路之间的一个中途站,华人为什么成为这里的主流群体,以及华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如何处理与他者、故乡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在座师生极大的兴趣与积极提问。

第十二讲“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游牧文化的变迁”由蒙古国立教育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高

级讲师Gerelt-Od Erdenebileg博士主讲。Gerelt-Od Erdenebileg博士首先对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土壤、植被、气候、人口、民族等自然与社会环境进行了简要介绍,进而从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与文化三个角度阐述了蒙古的游牧文化。他具体介绍了蒙古族的服饰文化、蒙古牧民夏天到草原放牧而冬天回城市居住的生活方式、蒙古包与蒙古游牧生活、蒙古马与马奶制品等。全球气候变化及城市化发展对蒙古游牧生活方式和游牧文化带来严峻挑战,牧民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蒙古人为了孩子教育等原因向大城市集聚,牧民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现代交通工具取代了马、骆驼等传统代步工具,互联网的普及与广泛应用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蒙古国政府试图通过每年定期举办那达慕大会等活动来保护游牧文化。

第十三讲“岭南文化的起源与传承”由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院长、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叶农教授主讲。叶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岭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特色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分体,以中华文化为根脉的继承体。岭南文化作为南迁的中原文化,对语言的认同、对本有文化的传承以及对域外文化的开放性吸收都展现出独特的面貌。岭南文化主要由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桂系文化和潮汕文化组成,叶教授重点介绍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广府文化。岭南文化丰富多彩,叶教授介绍了既保留古制又融汇中西的岭南建筑,以及岭南工艺美术、饮食文化、中医、说唱艺术、地方戏曲、岭南画派和岭南方言与民俗文化元素,还播放了优美的岭南戏曲,让听讲的同学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岭南文化独特的魅力。

第十四讲“隋唐长安城的设计‘新意’及其对日本平城京的直接影响”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王维坤教授主讲。王老师对隋唐长安城的整体布局设计做了细致的讲解。模仿“天体”建造的长安城,是一座“面南称王”的宏伟建筑,从里坊的排列和内部区划可以看出其建筑设计十分精细。长安城设计的新意主要在于它融合了《易经》乾卦六爻的思想,以及根据四神和阴阳形成了“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掌阴阳”的建筑格局。隋唐长安城对

于日本平城京的建造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后者的“太极宫”就是对前者“太极宫”的模仿。同时,日本平城京的建造反映出日本祖辈相传的工匠精神,正因为这样的精神,才能看出建筑物背后熠熠生辉的文化价值。

第十五讲“韩中日的文化认同和东亚共同体”在应用文理学院开讲。本次讲座由韩国加图立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奎泰(Lee, Kyu Tae)教授主讲,李奎泰教授认为,传统时代的东亚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的儒教文化或汉字文化圈,东亚韩、中、日三国对世俗礼节和社会规范传递的中国文化的学习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然而,近代以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东亚国家部分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进入21世纪,东亚三国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经济交流重新开始建立,也重新商讨如何重构和认同东亚新文化问题。李奎泰教授在讲座中介绍了韩中日三国东亚文化范式的演变,从朝贡体系范式到闭关锁国范式,再到军国主义范式的转移等;三国关系范式转移、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影响因素,如情结因素、制度因素等;新时期韩中日三国正从建构主义视角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建构新范式,如三国之间很多娱乐电视节目的模仿等。

第十六讲“香港地方文化——从近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育谈起”由香港珠海学院游子安先生担任主讲,讲座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香港地方文化的内容;第二部分为香港地方文化的特征及其由来;第三部分为香港的文化遗产保护,分别从几个案例谈起,如黄大仙信俗(国家级非遗项目)、港式奶茶(香港非遗项目)等;第四部分为香港文化遗产保育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以粤剧(人类非遗项目)为例。讲座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香港地方文化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引起了在座师生极大的兴趣。

“亚洲共同体与亚洲地方文化”系列讲座课程对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选课的同学开拓视野、更好地了解亚洲各国首都及地方文化,更深入地理解亚洲各国文化的联系和交往有很大帮助,同学们对亚洲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产生了诸多思考,并进而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

本刊通讯员

多名专家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

2018年10月至12月，北京学研究基地举办了多场学术沙龙活动，邀请多位境内外专家学者做客学术沙龙。

2018年10月22日上午，台湾清华大学环境与文化资源学系副教授、区域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荣芳杰博士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以“当代文化遗产管理的再思考”为题做了主题讲座。荣芳杰老师首先以诠释了文化遗产保护概念、理念、对象及其意义，指出文化遗产的保存与维护工作已经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文化政策，台湾文化遗产的保存与维护观念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包括西方国家文化观光（Cultural Tourism）或遗产观光（Heritage Tourism）的影响。然后，介绍了文化遗产管理的意义、对象、实施主体、时间、经费来源和手段等，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运营管理时代“文化遗产管理”（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的观念导入已成为文化遗产工作者不能忽视的课题，西方国家有很多遗产管理著作、国际研讨会等。最后，他阐述了价值导向、组织导向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遗产管理的实施路径，以及当代文化遗产管理的转型和选择等。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是传统知识和地方知识的建构和传承，要维系好文化遗产的价值必须具有专业的管理，必须与当代生活相联结，并将遗产持续传递给后代。

2018年10月29日上午，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朴喜用（Park, Hi-Yong）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城郭汉阳到大城市首尔的诞生”的沙龙讲座。朴喜用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韩国汉阳城的地理环境和依山傍水的区位特色，其依据《周礼·考工记》思想进行的规划设计，以及朝鲜迁都汉阳的历史过程；然后，介绍了汉阳城的八个城

门等主要历史建筑以及城门外的空间格局等；第三，介绍了汉阳城的营建过程，包括建城民丁的征集空间范围等；第四，介绍了汉阳城市的空间变迁，阐释了汝矣岛、永登地区和汉江以南地区是如何被开发和展起来的，以及大城市首尔是如何诞生的。

2018年11月5日上午，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生导师何彬教授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以“从欧洲到日本到中国记述文化的有效方式——简述民俗地图”为题做了主题讲座。何彬教授阐释了民俗地图和民俗地图法的定义，梳理了民俗地图的发展史，指出用符号记述民俗事项的地图称作“民俗地图”，将各种文化表象或某类事项用选定的符号或微缩图像标记于地图的、单项式或多项式分布图式文献数据表现方法，称作“民俗地图法”。民俗地图源于地理学科的一般性地图法，日后成为超越地理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记录空间和时间性文化表象的方法。它起源于欧洲，日本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配有民俗地图的民俗学论文，即柳田国男的“蜗牛考”论文里的图，是“日本第一幅民俗地图”。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俗地图已经被普遍运用于日本民俗学界的民俗调查记录和论文，成为常用的民俗研究技术手法之一，在日本民俗学界和语言学界获得有效发展。何彬教授指出，“民俗地图”可以使民俗学研究者利用地图的平面可视性和广范围显示性等特性，通过“民俗地图”认识民俗现象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表象特征，提取民俗传承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性质与文化意义，把握民俗的地域特性，进而分析和认识某项民俗或某个文化事项传承或分布规律。此次学术沙龙的目的也是回顾并检验民俗地图作为研究手法之益弊。

2018年11月6日上午，北京学研究基地邀请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项目助理教授张力亚博

士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大学社会责任的重新定位与省思”的讲座。张亚力博士认为在专业分工的知识养成需求上，大学教育越来越高度专业化、分工化，不断追求精准、深度学术研究内容，各大学都期盼能成为世界顶尖的大学；但是，与社会脉络脱节的学术研究往往导致大学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产生断裂，所以必须重新省思大学的社会责任，并且重新找到每所大学可以为社会贡献的社会实践内容与方法是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台湾自2012年起，面对科技社会整体发展的趋势，高等教育界重新思考“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个时代趋势中的角色定位。台湾有关政府部门推动“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计划”，企盼从人文关怀及学术研究创新的角度探讨台湾各区域当前面临的社会变迁问题。自2013年迄今，位于台湾中部山区的暨南国际大学省思大学在地化社会责任，积极扮演地方公共智库与人才培力孵化器两种角色，通过社会参与式教学途径与行动研究设计，连结在地城镇社群，共同探索包括城市韧性、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利益共享等问题在内的各项公共议题。具体做法包括成立跨专业的教师社群团队、策划教师社群团队举办共学实践活动等，发展共学共工的水沙连大学城。张力亚博士具体以桃米社区为例，介绍了大学参与社区资源调查、培训社区解说员、对村民进行农业休闲观光和民宿经营方面的培训，以及开展特色化教育、推动桃米生态村社区营造协力推动委员会的组建等方面的具体实践经验。

2018年11月12日上午，台湾佛光大学管理系主任、教授，佛光大学民宿研究中心主任陈志贤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台湾民宿的发展与特色”的讲座。陈志贤教授的讲座主要包含四个部分的内容。首先，他介绍了台湾及宜兰民宿发展的背景。台湾的民宿缘起于台湾南端的垦丁公园，众多的游客造成住宿的旅馆供不应求，于是供应简单住宿一晚的民宿因应而生。另外，1980年代末期，政府提出精致化农业，台湾农业面临转型，并于1997年陆续发展与农业旅游配套的设施，辅助乡村民宿和休闲农场建立休闲旅游的食、住、行、购、娱等旅游内容，这都促进了民宿的发展。其次，他介绍了台湾，尤其是宜

兰民宿的发展状况及特色。如陈教授介绍了2007年至2017年台湾的合法民宿数量及其增长率、住宿率，宜兰的合法民宿数量及其增长率、住宿率，并认为台湾民宿从2014年以后增长率逐渐下降，目前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此外，陈教授介绍了宜兰民宿的特色为山、海、田园、平地温泉等。第三，陈教授介绍了台湾民宿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趋势。如台湾未来民宿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包含差异化、多样化、动态发展的条件，以及非典型营销的条件。民宿未来发展的趋势有旅宿整合、产学合作等。第四，陈教授介绍了佛光大学于2015年成立的民宿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如所举办的宜兰民宿论坛，所开展的宜兰民宿诊断与辅导，所开展的民宿之诊断教育训练等，他认为大学应该为民宿的发展担任一定的社会责任。

2018年11月20日上午，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以“从一个小香炉开始：清代南洋华人如何建立自己的社会”为题做了主题讲座。王琛发教授指出，清代南洋华人开发区的垦荒社群，多以“公司”名义信道设教。这种公司与西方的责任有限公司不同，是一种公众的共同体机构，清代南洋华人通过这种形式维系武装高度自治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在开发当地资源的同时重建原乡文化面貌。王琛发教授在讲座中讲述了南洋华人如何从装有原乡神灵香火的香炉开始，形成了一种炉主制度，再通过“公司”这种体制，将各地同乡聚落进行凝聚，形成跨海认同的社群，应对当地殖民者权力体系，进行自己文化思想观念上的传承，引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讨论。

2018年11月26日上午，北京学研究基地邀请蒙古国立教育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Gerelt-Od Erdenebileg博士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蒙古生活方式变迁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讲座。Gerelt-Od Erdenebileg博士首先简要介绍了蒙古国的地理位置、土壤、植被、气候、人口、民族等自然与社会环境；然后介绍了100多年前乌兰巴托城市的形成与空间形态，以及1918年在俄罗斯人帮助下蒙古进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情况。当时的总

人口数为 647,500 人,绝大多数人信奉佛教,在过去 100 年间蒙古的人口快速增长,至 2010 年总人口数达到 2,754,400 人;最后回顾了过去近百年间蒙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蒙古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蒙古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以来,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与蒙古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加速发展的城市进程、互联网的普及等对蒙古人的宗教信仰、语言、教育、人口迁移、居住方式与聚落形态、生活方式等均产生重要影响。

2018 年 12 月 3 日上午,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院长、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叶农教授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以“香港历史与文化”为题作了讲座。香港是开放的自由港,有着发达的金融、贸易、旅游业和房地产业,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历经辉煌和低谷之后的香港,如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济寡头化导致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突出、经济创新动力不足等,叶教授从外部原因、内部原因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做了具体分析。最后,叶教授讲到了香港的文化,香港具有发达的教育体系,是近代以来改良维新革命思想诞生地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商业有关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是香港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上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王维坤教授应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如何用‘两重证据法’来研究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讲座。王维坤教授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他从王国维先生的“两重证据法”讲起,与同学们分享了他研究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的诸多成果。2004 年发现的井真成墓志,是唯一一方在我国发现的唐代留学生墓志。王教授在讲座中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和其他学者的重要观点,从井真成墓志发现的经纬、井真成墓志的书写格式、井真成改名问题三个方面对这方墓志做了系统的详细的介绍。

2018 年 12 月 17 日上午,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奎泰(Lee, Kyu Tae)教授应

邀做客北京学学术沙龙,作了题为“变化当中的南北韩关系和新东亚国际关系的范式”的讲座。他首先介绍了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及其矛盾;第二,李奎泰教授介绍了南北韩关系发展的历程,及其发展所受到的障碍;第三,李教授对比了南北韩的贸易总额、人均 GDP 等情况,并对比了南北韩关系与中国两岸关系的发展状况;最后,李奎泰教授展望了未来南北韩关系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下午,北京学研究基地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在学院路校区联合举办北京学学术沙龙,香港珠海学院游子安副教授应邀以“香港地方学近三十年的发展:以‘古今香港系列’与‘细味香江系列’为例说明”为题做了主题讲座。讲座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立足香港,研究香港”,通过《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香港卷)一书对香港地方文化的论述,介绍了“请进来”及“走出去”的香港地方学,指出香港历史从来不是从 1840 年才开始的,并探讨从大视野来看如何给香港定位;第二部分介绍了参与主编的“古今香港系列”“细味香江系列”与 1990 年代以来的香港地方学,并深入阐述了“细味香江系列”扎根历史,紧扣时代社会,深入乡土的特点;第三部分为“香港文库”《香港地方志》的编修等文化工程与近年香港地方学发展概况,指出香港地方学是多元的,跨地域的。游子安副教授的报告引起了在座师生的极大兴趣,互动热烈。

以上各位专家为北京学学术沙龙带来的精彩讲座,开拓了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师及其他学院、部门师生的学术视野。讲座之后的讨论也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机会,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碰撞和观点的分享。

本刊通讯员

首都文化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第二十一一次北京学学术年会通知（1号）

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北京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战略举措。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需要“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如何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推向新的高度，需要不同领域的人们共同关注思考。

有鉴于此，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学研究基地（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将与首都博物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地理学会合作，于2019年6月21-22日召开“首都文化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第二十一一次北京学学术年会”。诚望关心北京学研究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朋友们，百忙中拨冗参加会议。

会议主题：首都文化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主办单位：北京学研究基地

协办单位：首都博物馆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史研究会

北京地理学会

会议日期：6月21日京外参会人员报到

6月22日8:30本市参会人员签到，

9:00-17:00开会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会场地点将在2号通知中

告知。

会议规模：100人

会议费用：会场、会务、论文集印刷等和会议期间参会人员食宿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参会人员交通费用自理。

会议征文：请围绕会议主题撰写论文。论文集将于会前印刷成册，作为会议交流材料，会后从会议论文中择优推荐给《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期刊）发表，或收入《北京学研究2019》集刊正式出版。以下选题方向供参考：

1. 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内涵
2. 北京全国文化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 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影响力动态评估
4. 首都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体系
5. 北京古都文化的内涵、价值、保护与利用
6. 京味文化的内涵、价值、保护与利用
7. 北京红色文化的特色、价值、保护与利用
8. 北京创新文化的特色、价值、保护与利用
9. 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主体与路径
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意义
11. 北京“一城三带”文化层累过程与历史地位
12. 北京“一城三带”文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状况及特色
13. 北京“一城三带”之间的关系
14. 北京“一城三带”保护发展方向、原则与定

位

15. 北京“一城三带”及京津冀地区文化遗产连线成片保护传承利用路径

16. 首都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构建

17. 北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领区建设现状、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和对策

18. 北京学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应发挥的智库作用

征文要求：接受论文全文截止时间是2019年5月31日。论文字数5000—8000字。论文请附摘要（200—300字）、关键词（3—5个）、作者简介（50字以内，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学位、职称、工作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论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内容要详细，具体到页码，注释采用脚注形式列出，参考文献在文章结尾处列出。

论文评奖：本次学术年会将举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申请参评作者需在参会回执中注明。参评论文须保证原创性，从未发表，且作者同意会议主办方有权首发获奖论文。

参会回执：有意参会者请填写本通知后附“参会回执”。

报名截止：2019年5月10日

联系人：虞思旦，安亚男

联系电话：010-64900109，010-62004509

电子邮箱：bjxhy@buu.edu.cn

基地网址：<http://bjstudy.buu.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邮编：100101）

附件1：第二十一一次北京学学术年会参会回执

附件2：论文排版和参考文献格式

北京学研究基地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代章）

附件 1:

第二十一次北京学学术年会参会回执

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职务 / 职称	邮箱	电话	论文题目	是否发言	是否参评 优秀论文

附件 2:

论文排版和参考文献格式

一、论文排版

论文题目用黑体三号字。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正文统一用宋体小四号字。

二、参考文献

采用脚注形式，注释序号用①②③……，其体例如下：

1. 著作

标注顺序：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卷册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注：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下同，不再标注）；同一页所引文献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任者、书名可省略为“同上书”；同一页所引文献相同、页码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任者、书名、页码可省略为“同上”；责任者本人的选集、文集等可省略责任者。）

示例：

余东华：《论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2 版，第 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2. 译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国别、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其他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3.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①责任者 / 析出文献题名 / 所载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所载文集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刘民权等：《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关系分析》，载姚洋《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8—139 页。

4. 期刊、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报纸名称 / 出版年、月、日及版别。

示例：

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教育与经济》2001 年第 4 期。

杨侠：《品牌房企两级分化中小企业“危”“机”并存》，《参考消息》2009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

5. 转引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文献题名 / 转引文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转引文献题名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转引自魏宏聚《偏失与匡正——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 页。

参见江帆《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6. 未刊文献

(1)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文献题名 / 论文性质 / 地点或学校 / 文献形成时间 / 页码。

示例：

赵可：《市政改革与城市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0 年，第 21 页。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天津，2006 年 6 月，第 9 页。

(2) 档案文献

标注顺序：文献题名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编号。

示例：

《汉口各街市行道树报告》，1929 年，武汉市档案馆藏，资料号：Bb1122/3。

7. 电子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获取或访问路径。

示例：

陈旭阳：《关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及其战略的研究》，2003 年 11 月，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index.htm>)。

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http://>

xschina.org/show.php?id=10672)。

8. 古籍

(1) 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版本、页码。

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标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页码应注明a、b面。

示例：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夏州》，清金陵书局线装本。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

(2) 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出版者、出版时间 / 页码。可在出版年后注明“点校本”“整理本”。

示例：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xx页。

(3) 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 / 页码。可在出版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4)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卷次 / 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 / 版本或出版信息 / 页码。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文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

(5) 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

(6) 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

《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

(7) 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9. 外文文献

(1) 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出版地 / 出版者 / 出版时间 / 页码。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正体；出版地后用英文冒号，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下同）。

示例：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Cay May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p. 266.

(2)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所载书名或期刊名及卷册 / 出版时间，页码。析出文献题名用英文引号标示，期刊名或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正体。

示例：

Christophe Roux-Dufort, "Is Crisis Management (Only) a Management of Exception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Vol. 15, No. 2, June 2007.

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 通知（第1号）

为了促进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加强地方学的研究地方、挖掘文化、传承文脉、服务发展功能，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将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联合于2019年10月26-27日在北京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诚邀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朋友们莅临会议，分享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为做好本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与研讨内容

（一）会议主题

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

（二）研讨内容

本次研讨会主要研究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亚洲或各国各地区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现状
2. 亚洲或各国各地区地方学与地方文化比较研究
3. 地方学的概念、范畴、理论、研究方法
4. 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机构的组织框架与运营模式

5. 地方学学科发展

6. 地方、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地方的形成机制等地方理论

7. 地方感、地方文化认知、地方文化认同等地方文化理论

8. 地方学服务地方发展实践

9. 地方文化研究理论、方法与范式

10. 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11. 地方民俗文化

12. 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13. 地方节庆活动与文化遗产

14. 地方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15. 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二、会议主办与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

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

日本富士学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三、会议规模、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10月26—27日（10月25日报到）

地点：北京（具体会议地点将在2号通知中告知）

规模：80人

四、会议论文

提交时间：请围绕会议研讨内容，使用英文或本

国语言撰写学术论文。论文将于会前印刷成册，作为会议交流材料，会后择优选编文集正式出版。请于7月31日前提交会议论文题目、摘要，9月30日前提交论文全文（Word 电子版）。

论文字数及格式：论文字数 6000—10000 字，请附摘要（200—300 字）、关键词（3—5 个）、作者简介（100—200 字，包括姓名、国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职称、主要研究方向等）。论文注释、参考文献采用尾注形式列出。中文论文排版和参考文献具体格式请参见附件 2。

五、会议费用

会议不收注册费、会务费。会议期间餐费、参观考察交通费由会议承办单位负责。境内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境外参会人员往返交通费自理，住宿费由会议承办单位负责。会议承办单位将为会议发言专家提供部分交通费补贴。

六、会议报名与联系方式

（一）报名时间

会议报名，即日起开始接受，将截止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报名请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1）。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虞老师 安老师

电子邮箱：bjxhy@buu.edu.cn

联系电话：+86-10-64900109，+86-10-62004509

网 址：<http://bjstudy.buu.edu.cn>

微信公号：北京学基地

通讯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97 号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邮编：100101）

附件 1：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参会回执

附件 2：中文论文格式要求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

附件 1:

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参会回执

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职务 / 职称	邮箱	电话	论文题目	是否发言	备注

附件 2:

中文论文格式要求

一、论文排版

论文题目用黑体三号字。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正文统一用宋体小四号字。各级标题序号依次采用一、（一）1.（1）。

二、参考文献

采用尾注形式，注释序号用[1][2][3]……。具体体例如下：

1. 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卷册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注：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下同，不再标注）；同一页所引文献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任者、书名可省略为“同上书”；同一页所引文献相同、页码相同且注释顺序相邻时，责任者、书名、页码可省略为“同上”；责任者本人的选集、文集等可省略责任者。）

示例：

余东华：《论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 页。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2 版，第 7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 页。

2. 译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国别、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其他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3.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①责任者 / 析出文献题名 / 所载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所载文集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刘民权等：《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与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关系分析》，载姚洋《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8—139 页。

4. 期刊、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责任者 / 所引文章名 / 所载报纸名称 / 出版年、月、日及版别。

示例：

袁连生：《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不公平探讨》，《教育与经济》2001 年第 4 期。

杨侠：《品牌房企两级分化中小企业“危”“机”并存》，《参考消息》2009 年 4 月 3 日第 8 版。

5. 转引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文献题名 / 转引文献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转引文献题名 / 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初版除外） / 页码。

示例：

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转引自魏宏聚《偏失与匡正——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失真现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4 页。

参见江帆《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0 页。

6. 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文献题名 / 论文性质 / 地点或学校 / 文献形成时间 / 页码。

示例：

赵可：《市政改革与城市发展》，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0年，第21页。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天津，2006年6月，第9页。

(2) 档案文献

标注顺序：文献题名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编号。

示例：

《汉口各街市行道树报告》，1929年，武汉市档案馆藏，资料号：Bb1122/3。

7. 电子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获取或访问路径。

示例：

陈旭阳：《关于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及其战略的研究》，2003年11月，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index.htm>)。

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http://xschina.org/show.php?id=10672>)。

8. 古籍

(1) 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版本、页码。

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标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页码应注明a、b面。

示例：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夏州》，清金陵书局线装本。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

(2) 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出版者、出版时间 / 页码。可

在出版时间后注明“点校本”“整理本”。

示例：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xx页。

(3) 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卷次、篇名、部类（选项） / 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 / 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4)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卷次 / 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 / 版本或出版信息 / 页码。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文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

(5) 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

(6) 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

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

《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

(7) 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9. 外文文献

(1) 专著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书名 / 出版地 / 出版者 / 出版时间 / 页码。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

正体；出版地后用英文冒号，其余各标注项目之间用英文逗号隔开（下同）。

示例：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Charles M. Folsom,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p. 266.

(2) 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所载书名或期刊名及卷册 / 出版时间，页码。析出文献题名用英文引号标示，期刊名或书名用斜体，其他内容用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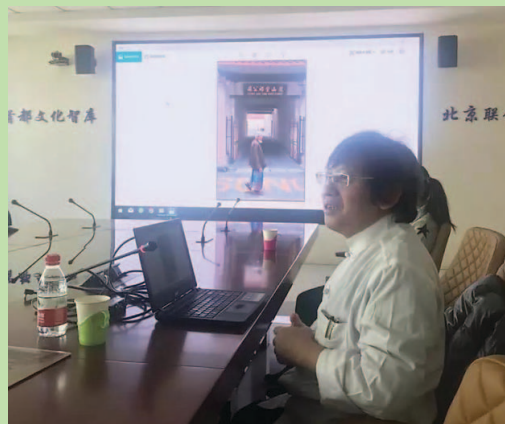
示例：

Christophe Roux-Dufort, "Is Crisis Management (Only) a Management of Exception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Vol. 15, No. 2, June 2007.

北京学学术沙龙部分讲座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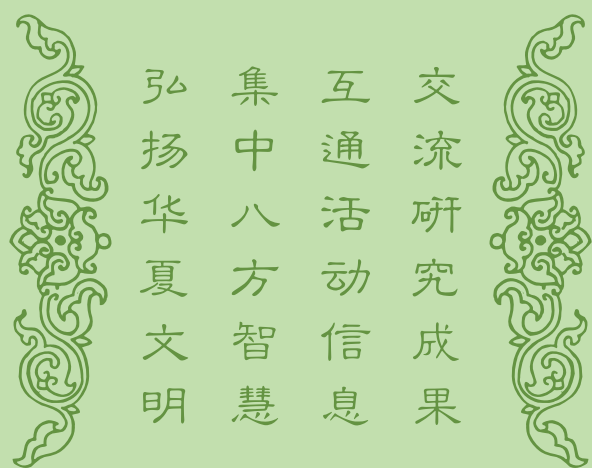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国平与部分听讲师生合影



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在做学术沙龙讲座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维坤在做学术沙龙讲座



交流研究成果
互通活动信息
集中八方智慧
弘扬华夏文明

